

## 戰爭與啟蒙：「歐戰」對中國的啟示\*

丘為君\*\*

當「歐戰」爆發後，雖然中國並未派軍直接參戰，但歐洲戰事的發展，在中國新興媒體如報紙與雜誌等連續而大量的報導下，成了這個亞洲新共和國大眾知識生活中的主要議題；歐洲新聞，由以往的配角躍升為新聞版面的主角。拜這場長達四年(1914-1919)之久的「歐戰」大劇之賜，中國知識界透過傳播媒體的力量，對西方文明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親近。「歐戰」對中國至少有四種啟示：第一，近代中國主要是從「文本」(text)的意義上體驗了「歐戰」。從1914年7月28日「歐戰」爆發至1918年11月11日大戰終了整整四年頭裡，中國經歷了一次獨特但深遠的經驗——在「文本」的意義上，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洗禮。「文本化」的「歐戰」，使中國知識界對「歐戰」的內涵有一個比較超然的理解，對西方文明的內涵(包括正面與負面)有較深刻的認識。第二，日本大隈重信(1838-1922)內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英國聯手發動的山東戰役，使中國的「歐戰」經驗，不僅止於虛擬(virtual)的「文本」上經歷，也在真實(real)的情境裡體驗到砲火的滋味。青島的淪陷與

---

\* 作者感謝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張力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先生對本文的批評與指正。東海大學社會系黃金麟教授與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潘光哲教授，提供了本研究所需的相關資料。在此一併致謝。

\*\* 東海大學歷史系。

接下來的「二十一條」，使中國與「歐戰」在負面的意義上連接起來，並啟動了影響近代中國深遠的「五四學生運動」。第三，「歐戰」使中國知識界對西方產生一種「啟蒙式」的親近。透過傳播媒體圖文並茂的解說，中國知識界第一次從「啟蒙」的意義上，深刻地見識到西方「富國強兵」的內涵與真相。近代中國的「啟蒙」經驗，由先前的「理論導向」，轉為「傳播導向」。第四，「歐戰」使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文明由敬畏轉為懷疑，由樂觀轉為悲觀。隨著有關戰爭殘暴本質與傷亡人數增加的報導持續地被揭露，西方「文明」與「野蠻」共存的現象，成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困惑。

關鍵詞：現代性、啟蒙、轉型期中國、東方雜誌、杜亞泉、歐戰、軍國主義、青島

「世事之進行為螺線，歷史之開展成圓周。吾人曩日報懷和平之理想，以為世界文明日進，則戰爭將從此絕跡，此理想殆不能實現矣。」

《東方雜誌》杜亞泉

二十世紀初在歐洲爆發的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由巴爾幹半島(Balkan)的區域衝突演變成全面性的歐陸戰爭，由單純性的軍事同盟演變為世界性的列強競爭。交戰國人民總數八億五千四百萬，幾乎佔了全世界人口數的半數。<sup>1</sup>大戰主要分為兩大陣營：以德意志帝國(German Empire)、奧匈帝國(Austria-Hungary)和義大利為首的「同盟國」(又稱「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和以英、法、俄為首的「協約國」(又稱「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sup>2</sup>這場戰爭，在歐陸稱之為「大戰爭」(the Great War)，中國知識界則泛稱為「歐戰」。就語意學而言，「歐戰」對中國來說隱然意味著「事不關己」。的確，中國政

<sup>1</sup> 陳蔭，〈歐洲戰時之經濟及財政〉，《東方雜誌》，12卷6號(上海，1915.06.01)，頁28。

<sup>2</sup> 德意志帝國與奧匈帝國在1879年結盟(Dual Alliance)，此兩國又於1882年與義大利結成鬆散的聯盟，形成「三國同盟」。法國與俄國於1891年結軍事聯盟，1904年英法兩國結盟，於是形成「三國協約」。

府在「歐戰」爆發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是抱持著中立的態度。但這種「中立原則」並未使中國免於砲火的侵擾；「歐戰」爆發後不久，英日聯軍便攻打青島的德軍，「歐戰」在中國本土以奇特的方式上演，中國在被动與無辜的意義上被捲入了「歐戰」。

本文無意探討中國政府對「歐戰」的態度，更不是要全面討論「歐戰」對中國的影響，而是試圖從啟蒙的角度，來探討中國的「歐戰」經驗：第一，「歐戰」在什麼意義上，帶給中國啟蒙的衝擊？其次，這種衝擊的性質是什麼？它是屬於一種積極的或消極的面向，或者兩者兼有？這一面向或這些面向的意義是什麼？第三，這種來自「歐戰」的啟蒙衝擊，對後來中國思想潮流的發展，尤其是「五四」前後的思潮，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 一、作為啟蒙的「歐戰」

所謂「作為啟蒙的歐戰」，這裡不是單純地指戰爭本身對中國的啟蒙效應，它更正確的意思是，大量有關「歐戰」的報導，使近代中國對令人敬畏卻又帶有神秘氣息的西方文明，產生前所未有的親近性。這種拜報紙與雜誌等新興傳播媒體之賜所產生的對西方文明的親近性，改變了晚清以來中國認識西方的途徑與方式，即由「菁英式啟蒙」轉為「大眾式啟蒙」。

「菁英式啟蒙」的途徑是，藉由少數拔尖菁英如嚴復(1853-1921)、康有為(1858-1927)、孫中山(1866-1925)、章太炎(1869-1936)，或梁啟超(1873-1929)等，基於民族與國家存亡之憂患意識對中國知識界輸入如民主、憲政、國家主義、改革與革命、物競天擇等等「重型知識」(Heavy Knowledge)。這種知識輸入的特徵是它採「由上而下」(Top-down)的取徑——一種「供給面」(supply side)意義的取徑。這種取徑相信，由於中國的衰弱主要是人民缺乏一種具有命運共同體意義的「群」意識，因此需要取法「明治維新」的積極方式，動用國家主要資源，傾全國之力以徹底改造這個衰老沈重的國度。這種帶有強制性意味的取徑認為，只有將這些深受封建意識荼毒的一盤散沙式百姓，轉化為心向國家、具有權利與義務意識的現代公民，即將傳統保守的「順民」

轉化爲自我作主、進取的「新民」，腐朽的中國才有再造成「少年中國」的可能。

### 從「菁英式啟蒙」到「大眾式啟蒙」

相對「菁英式啟蒙」的高調與積極性格，「大眾式啟蒙」是一種帶有教育式氣息的軟性手段；它透過具有快速播送、效率行政管理、企業化經營、經濟理性(講求合理利潤)等「現代性」(modernity)特質的傳播媒體，採取「由下而上」(Bottom-up)的取徑——一種偏向「需求面」(demand side)意義的取徑，以中國的知識大眾而不是菁英份子爲對象，用報導作爲基本手段，輸入以西方物質生活(material life)爲主要內容的「輕型知識」(Light Knowledge)。在「轉型期中國」(1895-1925)的啟蒙經驗裡，低調且具有消極性格的「大眾式啟蒙」並非主流，高調與積極性格的「菁英式啟蒙」才是引領時代風潮的代表。雖然如此，「大眾式啟蒙」的出現以及它愈來愈重要的啟蒙角色，意味著近代中國已經逐漸結束其現代性的「初始期」，而朝現代性的「穩定期」邁進。

就「大眾式啟蒙」的角度來看，從1914年7月28日「歐戰」爆發至1918年11月11日大戰終了整整四個年頭裡，中國經歷了一次獨特但深遠的經驗——在「文本」(text)的意義上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洗禮。當「歐戰」爆發後，雖然中國並未派軍直接參戰，<sup>3</sup>但歐洲戰事的發展，在中國新興媒體如報

<sup>3</sup> 「歐戰」爆發後，英、法、俄三國政府擬邀請中國參戰，而北京政府也頗有意願。然而由於日本認爲中國參戰將不利於該國，堅決反對此事。國窮兵弱的中國政府故然不敢得罪軍事強大的日本政府，英、法、俄等國身處大戰的漩渦中，更不願意與日本爲敵，從國際均勢的意義上要求中國參戰的想法，遂變得不切實際。另一方面，中國國內對此問題亦莫衷一是，大致而言可分爲參戰派與反戰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在朝，國務總理段祺瑞；在野，研究系首領梁啟超。他們認爲，參戰可以藉由結盟而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同時日後在和會中可以享有發言權。反對派的代表人物是：在朝，黎元洪與馮國璋；在野，孫中山、唐紹儀、康有爲，以及多數的各省督軍。他們宣稱：德國一向對華友善，英法列強不見得對中國親近。另外，中國本身是否有作戰能力與德國是否一定會戰敗，也都有疑慮。傅啟學，《中國外交史》(台北：商務，1957)，頁238-243。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研究》(台北：自費出版，1995)，頁29。李國祁，〈德國檔案中有關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幾項記載〉，《民國史論集》(台北：南天，1990)，頁

紙與雜誌等連續而大量報導下，成了這個亞洲新共和國大眾知識生活中的主要議題；歐洲新聞，由以往的配角躍升為新聞版面的主角。<sup>4</sup>誠如黃金麟在他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整個『歐戰』在中國的呈顯，就其綿密程度和引起的公共關懷而言，也的確如一場連續劇似的，在中國的言論舞台上演了四年。」<sup>5</sup>而在「文本」的意義上，能以廣度(世界性的眼光)、深度(分析國際事務的能力)、與連續性(時間的一貫性)等三項重要指標，來報導和刊載這場連續劇式「歐戰」的，無疑以「大眾式啟蒙」代言人面貌出現在近代中國的《東方雜誌》最具代表性。

#### 《東方雜誌》：「大眾式啟蒙」代言人

由商務印書館所辦理的銷售量高達一萬五千份左右的《東方雜誌》(1904-1949)月刊(後來改為半月刊)，<sup>6</sup>是近代中國出版發行時間最長的雜誌。賦予這個雜誌新靈魂的關鍵性人物是杜亞泉(1873-1933)。於1911年至1920年間出任《東方雜誌》九年主編的杜氏，<sup>7</sup>將原本以傳達官方理念為主的保守刊物，轉化為梁啟超式的、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評論性雜誌。這個自1911年3月25日8卷1號起改版的刊物，從世界的視野，以民間而不是官方的身份，意見獨立而不是帶有政黨意識型態的特質，在「歐戰」爆發前的民初社會裡，建立了一個具有思想深度形象的領導性媒體品牌。是以這樣的風格，《東方雜誌》帶領了與封建主義做最後戰鬥的民初中國，全程觀察、報導與分析「歐戰」爆發的背景、發展與影響，可以說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提

---

311-325。

<sup>4</sup> 中國報紙一向注重東亞新聞，對歐洲消息只是做填充篇幅而已。「歐戰」爆發後，因為事關重大，鮮有國家能置身事外，上海的報館才開始購買路透社(路透社)的電報，以取得快速的「歐戰」消息，以餉各界。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台北：學生書局，1976)，頁257。

<sup>5</sup> 黃金麟，〈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新史學》，第7卷第3期(台北，1996)，頁93-94。

<sup>6</sup> 曾虛白，《中國新聞史》(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66)，頁231，294。

<sup>7</sup> 王元化，〈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收於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頁2。

供了有關「歐戰」最具公信力、迅速、翔實而深入的資訊。<sup>8</sup>

我們若將《東方雜誌》與後來成為中國主流刊物的《新青年》做簡略比較，便不難看出兩者的「外部差異」。在「歐戰」爆發一年後由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當時稱為《青年雜誌》)，起初銷售量完全無法與《東方雜誌》相提並論；根據近人的研究，《新青年》在1915年創刊之初，每期僅發行一千份左右，可謂慘澹經營。它一直要到1917年「歐戰」近尾聲之際，才以「文學革命」這一議題建立其全國性的聲名，並在銷售份數上，與當時佔中國各雜誌之冠的《東方雜誌》並駕齊驅。<sup>9</sup>由此來做初步的判斷，如果說《新青年》是「新文化運動」的搖籃，那麼《東方雜誌》從1914年「歐戰」爆發以來，連續三年所做的「傳播啓蒙」事業，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之搖籃的推手。

《東方雜誌》在哪種意義上扮演了「大眾式啓蒙」的角色？

不過，這裡我們仍然不能輕易放過下述這些問題：「歐戰」爆發後，《東方雜誌》在哪種意義上扮演了「大眾式啓蒙」的角色？或者這麼說，《東方雜誌》主要是以那種論述的形式(form of discourse)，作為連接東西方文化的工作平台(platform)？冒著過份簡化的危險，我們大約可以歸納出三種面向作為討論的依據。第一，以建立主體意識作為「公共論壇」(public forum)與公共論述的特色。第二，建立「報導型知識」的典範。第三，以反省性或甚至是批判性作為公共論述的基調。

<sup>8</sup> 民國初年的報紙，根據1916年底的調查，約有289種，其中不乏具政黨背景者，例如由中華革命黨所辦的反對袁世凱報紙《民國日報》，便是國民黨在上海的重要言論機構。另外，反對國民黨的《時事新報》則是梁啟超系統「進步黨」的機關報。大體而言，民初的思想傳播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一方面在袁世凱當權的時期，中國的言論自由大受打擊。另一方面，一般新聞報紙受限於篇幅，只能對新聞做出報導，不容易有較為深刻的評論。政論雜誌如《東方雜誌》便頗能滿足當時社會中的某些階層。關於民國初年的報業情況，可參看曾虛白，《中國新聞史》第6章。

<sup>9</sup> 劉德美，〈「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張玉法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6輯(台北：聯經，1981)，頁483-484。

### 以建立主體意識作為公共論壇與公共論述的特色

關於「以建立主體意識作為公共論壇與公共論述的特色」，這裡隱含兩層意義：第一，就論述形式而言，《東方雜誌》以非官方身份的民間機構，建構了一個有效但獨立的知識溝通平台，讓多元的文化論點，在啟蒙或教育的意義上，給剛從封建專制的帝國和「泛儒家世界觀」中解放的知識大眾，提供了最可能的遼闊視野。但《東方雜誌》在文化史的價值並不僅僅是這些「外部性質」，而是這裡所要凸出的第二層意義——論述主體性(subjectivity)的建構。就這點而言，晚清以來或由官方、或由外國人、或由政黨所主宰的公共論述空間，至此進入了一個革命性的階段。

關於前者，《東方雜誌》所營造的公共論述空間，因為不以月旦國內政局為基調，因此在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7)可以安然度過新聞檢查的困境而繼續發展。1914年夏的「歐戰」議題，毫無疑義地，可以讓她進一步地找到更寬廣的空間。茲以「歐戰」爆發前後三期的《東方雜誌》內容變化做討論的依據。

「歐戰」爆發當月的《東方雜誌》，即1914年7月1日刊出的11卷1號，共收有十五篇文章，其中觸及國際事務的有八篇，佔一半以上。<sup>10</sup>但必須指出的是，有關「歐戰」爆發前巴爾幹半島的緊張局勢，本期雜誌並沒有任何的報導與討論。事實上，不只本期雜誌未能預見歐洲「一觸即發」的內在緊張，即便是「歐戰」爆發的前半年裡，在國際事務報導越來越多的《東方雜誌》裡，也只零星地見到一、二篇有關歐洲緊張局勢的文章(例如10卷9號，1914年3月1日，許家慶〈列強海軍之趨勢〉與〈巴爾幹諸國之新境界〉)。這或許與「歐戰」爆發出乎世人意料之外有關，但不容諱言，這也顯現了作為亞洲最大國的中國，在歐洲事務觀察人才上的匱乏。

雖然如此，當「歐戰」在7月28日爆發後，8月1日出刊的《東方雜誌》

<sup>10</sup> 包括有〈美墨之交涉〉、〈日本政界之風潮〉、〈美國限制移民之新計畫〉、〈愛爾蘭問題之新局面〉、〈英王遊法記事〉、〈愛爾蘭烏爾斯泰州之義勇軍團〉、〈倫敦中國協會報告略述〉，以及〈論日英對華同盟〉。

11 卷 2 號裡，直接觸及「歐戰」議題的便至少有四篇：〈歐洲大戰開始〉、〈亞爾巴尼亞王之入國與愛畢魯斯問題〉、〈奧義之協商〉，以及〈巴爾幹之新形勢〉。除了上述四篇涉及「歐戰」外，其他觸及國外議題的則有九篇(如果不將討論飛行學、物理學等科學議題的四篇包含進來的話)。換言之，在本期的二十四篇文章中，探討國際事務的文章共有十三篇，超過半數以上。在民初民風相對封閉與資訊不太發達的中國社會，以如此寬廣的國際視野作為經營傳播媒體的理想，應該不是很尋常的。

至於 9 月 1 日出刊的 11 卷 3 號，更幾乎成了「歐戰」專號，在所收錄的十八篇文章裡，與「歐戰」事物相關者超過半數。

《東方雜誌》於「歐戰」期間所刊登的大量有關國外事務的報導與分析，在公共論述空間的建構上究竟對中國的思想界產生何種影響？這裡我們提出兩重思考。第一，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在國防與外交上經歷一連串重大的羞辱性挫敗，不僅使國家面臨前所未見的生存危機，同時也使意味著國力強弱指標的「物質危機」，擴大到文明與野蠻對比的「文化危機」。日本從「世界的視野」出發，率先否定在東亞具有優越性的中華文明，視中國文化為「野蠻」，轉而擁抱「文明」的西方文化，<sup>11</sup>將文化論述由「中國論」轉向「西方論」(即「脫亞入歐論」)。<sup>12</sup>1894、95 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明確化日本「脫亞入歐論」(去中國化)的先見性與正確性。我們此處無法也無意深入日本「文化論述轉向」的深層意義，這裡的問題是，這種根源於晚清儒家學說無力對西方帝國主義做出有效回應所產生的「文化失敗主義」情緒，是否影響了近代中國的公共論述空間建構方向？即在 1895 年後處於一個「物質失敗主義」的環境裡，作為馬克思意義的「上層結構」

<sup>11</sup> 中英鴉片戰爭(1842)後，在日本流傳的「中國論述」書籍有齋藤竹堂的《鴉片始末》(1843)、板原雄《阿片亂記》(1845)、鹽谷宕陰編《阿芙蓉彙聞》(1847)、早野惠編《清英近世談》(1850)。這些書籍對日本的武士有深遠的影響。日本武士在操習武藝之外，便是研讀聖賢書，如今心目中的「聖賢之國」(中國)慘敗於「不知禮教」的英國，使日本武士對「洋夷」的評價不得不做出改變。許介麟，《日本政治論》(台北：聯經，1977)，頁154-155。

<sup>12</sup> 關於日本「脫亞入歐論」的討論，可參見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台北：桂冠，2002)。



(superstructure)的近代中國公共論述，是否也摻雜著「文化失敗主義」的陰影，無法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西方的文明？

第二，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傳統加上滿清二百五十年以上的「外來政權」高壓統治現實，近代中國的公共論述空間如何建立其具有獨立意義的自主性？在封建專制主義移除後的民國裡，在軍人主政的半封建半專制主義北洋政府時期，以及在國家主權處於列強宰制的半殖民地現實下，近代中國公共論述空間的自主性能夠被有效建構嗎？

戈公振在 1926 年完稿的《中國報學史》指出，晚清以來至「後五四時期」中國的新聞媒體發展約可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官報獨佔時期；第二，外報創始時期；第三，民報勃興時期；以及第四，報紙營業時期。<sup>13</sup>「官報獨佔時期」的特色是公共論述空間狹隘：清末官方的《邸報》是用來傳達統治者的旨意，而不是用來反應與傾聽民意。這一時期雖然外報、民報甚多，但多半為期甚短，基本上，人民並沒有公開地自由論政與表達個人思想的安全與客觀空間。<sup>14</sup>

「外報創始時期」的特色在於其言論反應外國人而不是本地人的權益。晚清民初由外籍人士以傳教和經商兩大目的所創辦的報紙，其文字有華文與外文之別。<sup>15</sup>這些報刊不論是在編輯或印刷上，都較中國者略勝一籌；然在當時的時空限制下，這些外資背景的媒體都深受來自本國的國家主義、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等觀念或立場的影響，以致在外交問題上，罕能以公正的態度來看待華人的生存環境並做出客觀的人道主義報導。<sup>16</sup>

至於「民報勃興時期」，其特色為以外報為形式而以政論為主題的報刊在晚清大放異彩，但這些新興傳播媒體的發展主要是拜設立於上海(租界)、香港(殖民地)，與日本(國外)等具有保護性環境之賜；其影響的侷限性是可以

<sup>13</sup>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29-30。

<sup>14</sup>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30。

<sup>15</sup> 外報的勢力，以英國人為最，日本次之，美國和法國又次之。日本人在中國創辦的華文報紙，以《順天時報》與《盛京時報》最稱著。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140。

<sup>16</sup>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30、143。

理解的。民報與官報、外報的主要差異在於，官報無民意可言，外報則主要反應外人的意見，民報的利基則在於能在動盪的時代裡，展現中國知識菁英的憂患意識與對時局的意見。由於時局動亂，民報犀利而聳動的言論，在 1895 年甲午戰後勃興，並在辛亥年間大放異彩。革命黨人的《民報》與維新黨人的《新民叢報》，便是這一時期中的翹楚。<sup>17</sup>

最後是「報紙營業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在於媒體的經濟獨立與具商業色彩。民國成立後，由於有「臨時約法」保障輿論，各地興起辦報風潮，全國報社數量曾經高達五百家。然而北洋軍人主政後，執行新聞檢查政策，限制言論，報館紛紛關門。客觀環境的惡劣，使政論性報紙不易生存，但具商業色彩的媒體則較容易發展。<sup>18</sup>

在這樣的雙重背景中，即在精神與文化上來自官方與外國的雙重抑制下，作為公共論述空間代表的民報主體性逐漸被建立起來。主體性的建構，如同傑出精神分析哲學家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所指出的那樣，是透過「他者」(the Other)的對照而顯現出「自我」(the Self)。前面我們引用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的觀點，即近代中國公共論述空間的營造，經歷了官報與外報兩個時期後才有民報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這意味著近代中國公共論述空間的建構，經歷了拉康所謂的「鏡像階段」(Mirror Stage)。

根據拉康，半歲至一歲半左右的嬰兒，透過鏡子的反射而看到並確認自我的形象，這是建立「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的起點。換言之，主體性的建構是透過外在的對照與反射而界定出來的。作為具有「認同」功能的「自我」並不會內在地界定「自我」，不會在缺乏外在對照的前提下獨自建構主體性；是「他者」協助界定了自我，或者更精確地說，是「他者」協助界定了「自我認同」。從這一角度來看，是「他者」在具象徵意義上的「鏡像」，讓自己看到並認識了「自我」。<sup>19</sup>

<sup>17</sup>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30、145。

<sup>18</sup>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240。

<sup>19</sup> 關於Lacan 在這方面的原創性觀點，可參看他的“The Subject and the Other: Alienation”及“The Subject and the Other: Aphanisis”，收入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的確，拉康關於主體性建構過程的「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關係，與瑞士語言哲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在其經典性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th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1916)的核心概念之一「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的「對立性存在」有相似之處。結構語言學的「能指」是一種功能性的概念，其存在與運作是靠著「所指」來決定的。拉康與索緒爾這裡的歧異點，至少就外部來看，在索緒爾那裡，具有功能性意義的「二元對立」是任意性的，即是「能指」與「所指」之間不必然有實質的內在連結。但是在拉康那裡，具有功能性意義的「二元對立」則似乎不是一種任意性的存在，即「自我」與「他者」並非是一個「無意義的連結」。以嬰兒而言，他／她在建立主體性的過程當中，是在處於受到保護的環境下(家庭)下展開其認知歷程。

如果後者的觀察是可信的，那麼《東方雜誌》的確是在「他者」的背景中建立其「自我」。這裡無法將《東方雜誌》當成對象做一個完整的討論，但是當我們從外部意義的目錄做初步的檢驗，尤其是以「歐戰」作為分水嶺，的確可以發現到作為當代輿論指標的《東方雜誌》在建立公共論述空間主體性上這一漸進的發展過程。

### 「報導型知識」的典範

除了公共論述空間的營造，《東方雜誌》在「報導型知識」的經營上，也樹立了一種新的風格——觀察的視野、敘述的方式、人道主義的關懷，與歷史的縱深等等。基本上，《東方雜誌》是在系統與完整的層面上，來報導「歐戰」的開展與意義；有別於時下報紙對西方事務「輕描淡寫」的特徵。《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以筆名「高勞」在1914年8月1日出刊的第11卷第2號《東方雜誌》裡，<sup>20</sup>率先以〈歐洲大戰爭開始〉為標題，對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公爵(Archduke Ferdinand, 1863-1914)在波斯尼亞(Bosnia, 今

---

*Psycho-analysis* (London: Vintage, 1998).

<sup>20</sup> 杜亞泉在《東方雜誌》上常用的另一個筆名是僮父。

譯為波士尼亞)被刺殺後所爆發的「歐戰」(7月28日),做了一個十分具體且詳細的背景說明。在本篇開始處作者這麼說道:

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匈國皇儲飛蝶南公(按,即斐迪南公爵),與其妃蘇斐雅喬丹,在波斯尼亞猝遭殺害,兇手為塞爾維亞人。嗣奧匈國政府要求塞國政府,懲罰暗殺事件之關係人,並抑壓塞民排奧之運動,由奧匈政府派員監督。塞政府拒其要求,於是兩國外交斷絕,於七月二十八日宣戰。俄以民族關係而援塞,德以同盟關係而援奧,法以協商關係而助俄。至七月之終,而俄法與德奧,均至以兵戎相見。英雖力持調停,然以三國協商故,勢亦將牽率而入於漩渦之中,斯誠近代未有之巨變,而開二十世紀之創局者矣。<sup>21</sup>

在這個充滿歷史意識的「前言」裡,杜亞泉對這個才剛剛發生的戰爭做出「結論」式的論斷,他說:

歐洲自滑鐵盧綏丹兩役以來,諸大強國皆汲汲以保持和平為務,民生不見兵革之禍者,蓋五六十年。乃風雲驟起,天地變色,數十年中所維持調護者,忽破裂而無餘;數十年中所休養生息者,忽犧牲而不惜。戰端一啟,其影響所及,豈吾人所得而逆料乎?<sup>22</sup>

在這篇文字清晰的八頁報導裡,作者不僅僅解說了戰爭在歐陸爆發的原因,也更在結論處提醒中國讀者這場戰爭對東方的可能影響。他指出,日本是英國在亞洲的盟友,如果英德開戰,那麼戰事就會延伸到東亞來,因為日本一定會協助英國來對付德國。杜亞泉以政治觀察家的角色建議道,中國於列強之間,雖然沒有特別的利害關係,而且基本上居中立立場,但必須預防於萬一,因為列強「乘機而起,以櫻利益取霸權犯中立者」,不是不可能的。<sup>23</sup>

41歲的杜亞泉對國際局勢發展的關注並不只停留在報導層次,而是在綜合的層次上進行分析。所謂「綜合的層次」,這是指除了對上海的各中外報

<sup>21</sup> 高勞,〈歐洲大戰爭開始〉,《東方雜誌》,11卷2號(上海,1914.08.01),頁5。

<sup>22</sup> 高勞,〈歐洲大戰爭開始〉,《東方雜誌》,11卷2號,頁5。

<sup>23</sup> 高勞,〈歐洲大戰爭開始〉,《東方雜誌》,11卷2號,頁12。

紙言論做綜合的功夫之外，杜氏還對當時亞洲資訊最發達的日本東京各主要報紙，進行掃瞄式歸納。<sup>24</sup>由於東京主要的報紙常有駐歐洲特派員，因此其對「歐戰」的報導與分析，常有與西方不同的視野。另外在取材上，由於東西文化上的差異，他們往往能注意到歐陸當地記者所疏忽的問題。我們以杜亞泉在《東方雜誌》11卷3號(1914年9月1日)用筆名「高勞」發表的〈大戰爭續記〉來看，便不難發現杜式風格的特徵：

自奧塞開釁以後，俄援塞，德助奧。法與俄有協約，德既敵俄，乃先制法。比與法為接壤，德欲攻法，乃先犯比。英以保比之中立而出師大陸，日以英為同盟而構兵青島。一月以來，戰鬥相尋，勝敗互見。其事跡之落落大者，或由交戰國政府之公布，或由歐美電社之通信，吾人得略知其梗概。至軍隊之位置行動，攻守進退，與夫兵力之厚薄，死喪之多寡，交戰國既嚴守秘密，吾輩僅從日報中得一鱗一爪之消息；亦或袒護己國，詛咒敵國，諱敗飾勝，失其本真，未堪據為事實。故欲知歐洲戰爭之真相，不能不待於異日之戰史。<sup>25</sup>

如此簡單二百餘字的文章「緒言」，便能在資訊相對匱乏的民初時代裡，將千里之外錯亂紛雜的「歐戰」理出頭緒。杜亞泉以連載的方式在《東方雜誌》寫出的〈大戰爭續記〉，從1914年8月的〈歐洲大戰爭開始〉(11卷2號)，直到1917年7月刊出〈大戰爭續記十二〉(14卷7號)為止，總共維持了整整三年之久，成為整個「歐戰連續劇」最重要的東方作家。這個系列報導後來集結成冊，以《歐戰發生史》為名編入商務印書館的《東方文庫》(1924)。<sup>26</sup>《東方雜誌》的〈大戰爭續記〉(或集結成冊的《歐戰發生史》)是在完整的意義上罕見的有關西方單一重大事件的論述；這一文獻在對「歐戰」的報導、評論，與分析上，充分展現了東方的視野與作為歐陸帝國主義壓迫者之中國知識份子的反省與批判。雖然如此，它卻不是近代中國「西方主義」

<sup>24</sup> 高勞，〈大戰爭續記〉，《東方雜誌》，11卷3號(上海，1914.09.01)，頁11。

<sup>25</sup> 高勞，〈大戰爭續記〉，《東方雜誌》，11卷3號，頁11。

<sup>26</sup> 參見黃金麟，〈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新史學》，第7卷第3期，頁99。

(Occidentalism)論述，至少與日本明治時期思想家岡倉天心(Kazuko Okakura, 1862-1913)在 1903 年以英文出版的《東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裡所表達的反對西方文明之侵略性的「大亞洲主義」(亞洲一體觀)論述有所不同。

### 以反省性或甚至是批判性作為公共論述的基調

除了公共論述空間經營以及報導型知識特徵，《東方雜誌》所展現的「大眾式啓蒙」也以反省性或甚至是批判性作為公共論述的基調。在這方面，它具有下述兩項特色：積極的歷史意識與消極的國際觀。以國際事務報導為基調的《東方雜誌》，在近代中國人最缺乏的國際視野上推廣國際觀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發展中的國際觀，經常是以歷史意識作為基礎，與西方在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以後「去歷史化」的主流思潮有別。

豐富的歷史意識是「轉型期」菁英的共同特色，在晚清社會裡不論是改良派領袖如康有為或梁啓超，或革命派領袖如孫中山與章太炎，或甚至是武人出身如袁世凱(1859-1916)等，都能以其歷史意識作為其思維的主要工具與做出重要決策時的主要依據。「轉型期中國」此一歷史意識運作，在功能上與德國在十九世紀時於歐陸思潮中獨樹一幟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有極多相似之處。在十九世紀德國，「歷史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思維方式——在廣義上，知識與思維發生歷史化的現象。這種強調縱深概念的「歷史化的思維方式」，是與啓蒙運動以來受到自然科學影響、以理性為基調的、注重橫向面的自然法倫理思維方式相對的。與後者關注「普遍性」(universalism)的精神相異，前者重視的是具有「特殊性」(individualistic)意義的現象——人在歷史變化中的各種行為問題。作為一種思維的方式，德國的「歷史主義」並不是歷史學者或人文知識份子所獨有的，而是整個民族共有的資產；職是之故，它甚至擴大到國家、法律、道德、宗教，以及藝術等等領域，並以此

作為基礎來發展德意志人獨特的世界觀——歷史主義式的世界觀。<sup>27</sup>

在民初的《東方雜誌》裡，歷史意識不僅作為分析時務的工具，也更用來作為反省世局的依據。茲以杜亞泉在「歐戰」爆發不久後所發表的〈大戰爭與中國〉(11卷3號，1914年9月1日)為例。他在文章的開始處如此論道：

天道十年一小變，百年一大變。未來之變局不可知，就以往之變局推之，則吾人今日，不可不以兢兢業業之心，臨此未來之變局。蓋今日之歐洲各國之大戰爭，實為百年以來之大變；而其影響於吾中國者，亦將為十年中之小變焉。<sup>28</sup>

這裡，杜亞泉所關心的問題是「歐戰」對中國的影響，而他用以推論世局的思維工具，便是歷史意識。他從當前的1914年戰事往前推一百年：

歐洲在百年以前，為法帝那破崙全盛時代。自莫司科退兵以後，俄普奧瑞之同盟軍，來因同盟之日耳曼軍，與惠靈吞侯所將之英吉利軍，合攻巴黎。那破崙辭帝位，僅為地中海中愛爾拔孤島之王。歐洲諸國，開維也納會議，議戰後之處分，此一八一四年事也。<sup>29</sup>

唯恐這一分析不夠說服力，杜亞泉繼續以其歷史意識往前推進到二百年前：

更回憶二百年以前，則為法之路易十四世稱霸時代，前後戰爭凡四起，西班牙、荷蘭、日耳曼、意大利諸國，皆被其侵略。英吉利、葡萄牙、瑞典之兵，皆被其撓敗。然勃倫哈姆之戰，卒為英將馬爾伯羅、奧將歐熱尼所破，割地以和，各國開拉士達會議，而路易十四世之霸局，於是終結。此一七一四年事也。<sup>30</sup>

由此，杜亞泉歸結道：「此次戰爭，其結果之重大，將不減於勃倫哈姆與滑鐵盧之兩役，當為世人所深信。」<sup>31</sup>

<sup>27</sup> 關於歷史主義問題，可參看Paul Hamilton, "The Rise of Historicism," in his *Historicism* (NY: Routledge, 1996), pp. 30-50; 胡昌智,《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1988),頁108-124; 黃進興,〈歷史主義〉,收入《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台北:允晨,1992),頁11-116。

<sup>28</sup> 詹父,〈大戰爭與中國〉,《東方雜誌》,11卷3號,頁1。

<sup>29</sup> 詹父,〈大戰爭與中國〉,《東方雜誌》,11卷3號,頁1。

<sup>30</sup> 詹父,〈大戰爭與中國〉,《東方雜誌》,11卷3號,頁1。

<sup>31</sup> 詹父,〈大戰爭與中國〉,《東方雜誌》,11卷3號,頁1-2。

必須指出的是，杜亞泉這裡具有濃厚歷史意識的時局分析，其結論是帶有悲觀主義色彩的。在他看來，人類並沒有從歷史裡記取教訓，文明的推進也從來沒有消滅過野蠻的戰爭。「世事之進行為螺線，歷史之開展成圓周。吾人曩日報懷和平之理想，以為世界文明日進，則戰爭將從此絕跡，此理想殆不能實現矣。」<sup>32</sup>作為《東方雜誌》的精神領袖，杜亞泉以積極的歷史意識來反省時局，但卻是得到一個悲觀主義的結論。

與這種悲觀主義的歷史意識相伴而來的是低調的國際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仍處於馬克思學派學者所謂的「半封建半殖民」處境裡。在此一情境中，中國國際地位的低落，是不言自明的事實。從中國知識份子的角度看，歐洲列強在大戰中誰勝誰敗，似乎都不能改變中國國際地位低落的現狀。反而是，當歐洲列強彼此保持著「恐怖平衡」，對這個亞洲的貧弱大國，可能更有利。杜亞泉的意見如此表白：

戰爭之結束，將為德奧之勝利乎？抑為英俄法所屈服乎？戰事之終結，將在何時？戰爭之損失？至如何地位？吾人皆未敢臆斷。以吾儕之希望言之，則交戰之兩國際團體，苟有一方面完全勝利，一方面完全屈服者，則均非吾中國之福。<sup>33</sup>

杜亞泉「苟有一方面完全勝利，一方面完全屈服者，則均非吾中國之福」的意見，雖然是媒體觀點，但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中國方面對「歐戰」的低調。這種低調的國際觀確信只有當歐洲保持均勢，中國對「歐戰」保持中立原則，那麼在「弱肉強食」的環境下、在列強夾縫裡求生存的中國，才能獲取最大的利益。

吾國近十年中外交狀態，固賴列強均勢之局，得以維持，無容諱飾。歐洲均勢之破壞，其必非吾國之福，不待智者而知。故嚴正之中立，實我政府及我國民共同之意思也。<sup>34</sup>

<sup>32</sup> 詹父，〈大戰爭與中國〉，《東方雜誌》，11卷3號，頁2。

<sup>33</sup> 詹父，〈大戰爭與中國〉，《東方雜誌》，11卷3號，頁4。

<sup>34</sup> 詹父，〈大戰爭與中國〉，《東方雜誌》，11卷3號，頁4。



## 二、青島：血染的風采

《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在 1914 年 7 月 28 日「歐戰」伊始時以站在時代尖端的媒體人身份所表露的國家安全憂慮，並不是無的放矢。就在他於 8 月 1 日發表〈歐洲大戰爭開始〉一文不到一個月內，日本大隈重信(1838-1922)內閣(4 月 16 日組閣)於 8 月 23 日藉口英日同盟而對德宣戰，與英軍合作向青島進軍，砲火著著實實地在中國的土地上開打起來；完全無視於中國政府外交部在 8 月初的〈局外中立條規〉通告，宣稱各國不得在「歐戰」爆發後於中國領土及各租界地交戰。<sup>35</sup>

作為孔、孟聖人的故鄉，山東卻是近代中國最貧窮的省分之一。青島本是山東省東南一個藉藉無名的小漁港，但因緣際會一躍而為近代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景點。十九世紀末的「瓜分中國」風潮由它而起，二十世紀上半葉牽動中國思潮發展的「五四運動」，也與它緊密關連。在這裡，我們看到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角力。我們看到西方帝國主義與宗教啟蒙主義 (religious Enlightenment) 的聯結。但我們也看到政治與宗教的糾葛，尤其是我們還看到代表西方文明最高境界之一的道德團體——教會——在華進行的「靈魂拯救工程」(Soul Rescue Project)，變成了與理論上要被「救贖」的中國的「排外情結」(xenophobia) 或「排外民粹主義」(anti-foreign populism) 對立。這些沈重的問題當然不是本篇所能解決的，不過這裡我們仍然要問，如此一個窮困省分的荒僻小漁港，為何在關鍵的歲月裡扮演了一個關鍵性的角色？這是一個歷史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

### 馬關條約與走上歷史舞台的青島

青島走上歷史的舞台，與 1894 年影響近代中國歷史深遠的中日甲午戰

---

<sup>35</sup> 日本在攻打青島之前，還向美國聲明德國須無條件交出青島，以便最後歸還中國，並表示對中國無土地野心。見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1914年8月。

爭有關。甲午戰敗，滿清政府除了根據「馬關條約」(1895)第四款賠償日方天文數目的軍費白銀二億兩(分八次交完)之外，還要根據條約第二款割讓遼東半島、台灣與澎湖給日本。日本快速擴張的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引起了歐陸帝國主義者德國、法國與俄國的憂懼，而有了所謂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三國干涉還遼」並非國際正義的伸張，而是各國基於現實利害關係所做的強權外交手腕。德國在 1880 年代之後由於快速工業化以及歐陸各國採取關稅保護政策關係，與其他國家在海外的競爭日益激烈，與英國和美國的關係尤其是。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的抱負是：既然先祖威廉大帝(Wilhelm Friedrich Ludwig, or Wilhelm I of Germany, 1797-1888)的成就在於使德意志帝國成為歐洲之強國，成為歐洲最大的陸軍國；那麼自己的使命便在於使德意志帝國成為世界之強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海軍國。<sup>36</sup>考慮到每年四億馬克的商業活動，威廉二世在 1888 年即位後，便處心積慮地要在遠東取得一港灣，以確保其在亞洲的利益，思慮將「歐洲」的德國轉為「世界」的德國。<sup>37</sup>職是之故，遼東半島對面的山東半島便是德國的重要考量，而青島更是勢在必得的首要目標。

### 膠州灣事件(1897)

1897 年 11 月 14 日，德國以山東曹州(今荷澤)教案，藉口兩名神語派(Divine Word)傳教士 Richard Henle 和 Franz Nies 在 11 月 1 日夜晚被殺，<sup>38</sup>於是在德皇的授意下，由海軍司令 Admiral Diedrichs (Otto von Diedrichs,

<sup>36</sup> 章錫琛，譯日本《中央公論》，〈從文明史國際史上觀察歐洲戰爭〉，《東方雜誌》，11卷5號(上海，1914.11.01)，頁27-28。

<sup>37</sup> John E.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2-23, p.33; 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研究》，頁19-20。

<sup>38</sup> 以博學稱著的唐德剛在其《晚清七十年(4)義和團與八國聯軍》(台北：遠流出版社，1998)中指出，位於山東省西南部的曹州府，素以民風強悍知名。他說，《水滸傳》裏的「梁山泊」，便在曹州境內。唐朝末年「黃巢殺人八百萬」，也是從曹州開始的。繼洪楊而起的「捻軍」，也起於這一帶。

1843-1918) 率領官兵七百名左右，強佔膠州灣，奪據青島砲台。<sup>39</sup>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膠州灣事件」，也是青島與歷史交涉的開端。必須指出的是，德國發動「膠州灣事件」，姑且不論其道德上的正當性，在十九世紀末當時那個處於高度國際生存競爭的大環境下，對這個基本屬於內陸型的國家，的確有一種如箭在弦的焦慮或壓迫。理論上應該是「出世」(other-worldly)的宗教，卻也牽扯入德國軍國主義本質的政治，頗能說明德意志帝國此種如箭在弦之「擴張主義焦慮症」的現象。

1881 至 82 年曾在山東省首府濟南學習過華語的安治泰神父 (Father Anzer, ?-1903)，於 1885 年 12 月被羅馬教皇任命為南山東地區首位代理主教 (Vicar Apostolic)。<sup>40</sup>他在職位上是 Henle 與 Nies 這兩位在山東曹州遇害神父的管區上司。Henle 與 Nies 神父在曹州遇害時，Anzer 主教正好在德國柏林出差。他以神職人員的角色在 1897 年 11 月 7 日，即是 Henle 與 Nies 遇害後一週間，在柏林對德國外事部(Foreign Office)的官員表示，此刻是「我們佔領膠州灣最有利與最佳機會」(the opportunity to occupy Kiaochou, by far the best and from every vantage point the base with the finest capabilities for development for us)。<sup>41</sup>幾天後，他對上述這一「用武」觀點做了更明確的解說：「這是德國在亞洲擁有一席之地與樹立日漸衰頹之國威的最後機會。」<sup>42</sup>他

<sup>39</sup> 山東教案發生的原因，是由一樁單純的民事案件，演變為國際大事，事故的關鍵是1897年11月1日(光緒23年10月)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游民惠潮現等人到鉅野縣張家莊教堂行竊，但被教士所發覺。德方教士基於人身安全，乃予以開槍射擊。竊賊遭此攻擊，於是改竊為劫，殺傷了德國傳教士。德方以日前壽張縣教堂也有被搶劫的經驗，於是便認定這些事件並不單純，而是有大刀會在背後支持的「仇外情緒」(xenophobia)與反教舉動。清廷早已洞知德國本欲借海口，將以此為藉口，乃責令山東巡撫李秉衡查辦此事。然而就在同一時間，德方已經向膠澳出兵。參見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莊樹華，〈《膠澳專檔》介紹〉，資料來源：<http://archives.sinica.edu.tw/main/diplomatic09.html>。John E.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pp.33-42. "Beginning in Shantung,"(SVD History in China)資料來源：[http://www.svdchina.org/eng\\_chinahistory\\_01.htm](http://www.svdchina.org/eng_chinahistory_01.htm).

<sup>40</sup> "Beginning in Shantung," (SVD History in China), 資料來源：[http://www.svdchina.org/eng\\_chinahistory\\_01.htm](http://www.svdchina.org/eng_chinahistory_01.htm).

<sup>41</sup> John E.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pp.33.

<sup>42</sup> "It is the last chance for Germany to get a possession anywhere in Asia and to firm up our prestige

鄭重指出，無論花任何代價，「我們都不能放棄膠州灣，因為它有一個經濟與工業發展的前景，而這個前景將比現在的上海更大、更有意義」。<sup>43</sup>由此可見，中國知識菁英在晚清視天主教與侵略性的帝國主義乃「一物之二面」，並不是無的放矢。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放過這一思考：宗教與政治之間的糾葛，即宗教是否一定要為政治服務(至少就德國而言)，的確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如果宗教屈服於政治，那麼它是暫時的問題還是永恆的問題？即它是現實的問題還是本質的問題？如果是現實的問題，則這是德國的個案問題還是歐陸普遍的問題？如果是德國的個案問題，那麼在本質上這是一個宗教問題(宗教政策)還是政治問題(帝國軍國主義)？

姑且不論上述帝國主義與宗教間之聯繫的本質為何，從 Anzer 主教的言論來判斷，德國用兵中國顯然是國家上層的普遍共識，由此假設出發，德意志帝國進兵青島當然是經過仔細設計的，而不是偶發或隨機的軍事行為。下面這條證據可以支持此一觀點。在德皇下令奪取膠州灣前，為了確保俄國對山東沒有興趣，且不會阻撓德國的軍事行動，威廉二世還特別禮貌地詢問俄國沙皇尼古拉(Czar Nicholas II, 1868-1918)的意向。德國是直到威廉二世收到俄國沙皇「不支持也不反對德國對膠州灣用兵」(Cannot approve nor disapprove your sending German squadron to Kiaochow)的回電後，才於 1897 年 11 月 7 日下達用兵膠州灣之軍事行動命令。<sup>44</sup>

「膠州灣事件」爆發後，中國外交界元老、兩年前因與日本訂下羞辱性「馬關條約」而被卸下長達 25 年之久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的李鴻章(1823-1901)，以 74 歲高齡復出斡旋此事。李鴻章以梁啟超所謂的「戰國策思維」企圖「連俄制日」，<sup>45</sup>但效果不彰。1897 年 11 月 20 日，德國以曹州

---

which has dropped.” See John E.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p.33.

<sup>43</sup> “no matter what is costs, we must not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give up Kiaochow. It has a futur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ndustry, a future which will be greater and more meaningful than Shanghai is today.” John E.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p.33.

<sup>44</sup> John E.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p.33.

<sup>45</sup> 梁啟超，《論李鴻章》(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1)，頁67。

教案向滿清政府提出六條要求：為被殺害的教士立碑、賠償、山東巡撫李秉衡應革職永不敘用、准德人在山東有路權及礦權，以及租借膠州灣。清廷要求德先退兵再行商議，並將德所提六款透露給他國。<sup>46</sup>但滿清政府此舉並未發生效應，原先答應助華的俄國雖在 11 月 16 日由外務大臣模拉維夫(Muravieff)訓令柏林俄使，反對德國佔領膠州灣；但在數日間便變卦。在德國向滿清提出六條要求的 11 月 20 日，俄方突然撤銷俄艦駛往膠州灣的命令，改變了原先反對德國的態度。<sup>47</sup>俄國態度的急轉直下，證明了「李鴻章原則」(即其「戰國策思維」)的失敗，至此，膠州灣的前景便往對中國不利的方向發展。

「李鴻章原則」的失敗，不只是他個人事業的失敗，也是整個中國政治菁英的失敗。強調「結盟主義」的「李鴻章原則」，在理論上是跳脫了先前「以夷制夷原則」的框架，可說是具突破性的外交政策。「以夷制夷原則」基本上是軍事概念，其精神是用外國人製造的先進武器來對付外國人。「李鴻章原則」則是外交觀念，強調聯合某國來對付某國。我們知道，李鴻章在「膠州灣事件」爆發前一年有過遊歐的經驗，除了在俄國拜見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sup>48</sup>還在德國見過「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sup>49</sup>在巴黎觀見法國總統(1896年7月14日)，<sup>50</sup>在英國謁見過以性格孤僻著稱的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 1819-1901)，<sup>51</sup>於 1896年8月31

<sup>46</sup> 莊樹華，〈《膠澳專檔》介紹〉。另參見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2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頁975。

<sup>47</sup> 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2冊，頁975。

<sup>48</sup> 1896年3月27日，73歲的李鴻章以中國專使的身份前往俄國，為28歲的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祝賀。李氏在4月30日抵達俄京聖彼得堡，於5月初觀見俄皇兩次，談判中俄鐵路問題。李鴻章使俄的最重要成就為6月3日於莫斯科簽訂「中俄同盟密約」六條：兩國共同防禦日本，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可以穿過中國的黑龍江與吉林省，條約效期15年。參見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2冊，頁953-54。

<sup>49</sup> 李鴻章在1886年6月27日晤俾斯麥，向他請教中國復興之道。俾斯麥回答道：勤練精兵。見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2冊，頁954。

<sup>50</sup> 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2冊，頁955。

<sup>51</sup> 李鴻章在1886年8月5日觀見維多利亞女王。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2冊，頁956。

日拜訪美國總統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sup>52</sup>這些出使歐美的經歷，自然讓他明瞭十九世紀末歐陸強權所進行的「結盟外交」策略的神秘效應。不幸的是，如同梁啟超所指出的，李氏的「戰國策思維」並未得西方「結盟外交」的箇中三昧，僅是學得其皮毛。歐陸強權的「結盟外交」，其友誼是長期建立的，其利害關係是建立在互助互利的基礎上；而李鴻章自以為得西方外交精髓的「合縱連橫原則」，則是缺乏長期經營的「臨時抱佛腳型」，其失敗是理所當然的。<sup>53</sup>

#### 《膠澳租界條約》：德國強行租借青島

李鴻章在海外遊歷的盡興與得意，及受到各國政要殷勤招待的豪華與舒適，但都不能改變國際上「弱肉強食」的冷酷現實。「李鴻章原則」並沒有使德、俄兩國疏離，反而在「德國不進入直隸與滿州，俄國可以不反對德佔膠州灣」與「德國可協助俄國抗日」的前提下，讓德、俄結合起來。俄國除了因為和德國有所默契而有恃無恐地派艦佔據旅順外，還進一步地在 1898 年元月勒索式地要求租借海港與中國在內需建設上須向俄國而不是他國借款。<sup>54</sup>為了擔心自己在華權益受損，以當代文明大國自視的英國，也加入逼迫中國貸款與租借港口的野蠻遊戲。<sup>55</sup>英國恐怕以一己之力無法與歐陸其他強權對抗，因此特別邀約了美國加入，共享在華利益。<sup>56</sup>就在西方強權這些軟硬兼施的逼迫下，無力的滿清政府最終是向德國讓步：李鴻章與翁同龢(1830-1904)在 1898 年 3 月 6 日與德國駐華公使海靖(Herr von Heyking)訂定《膠澳租界條約》十款，其中約定膠澳租界、鐵路礦務及山東全省辦事之法三端。主要內容有：(1)膠州灣及灣內各島租與德國，為期 99 年。租期內膠州灣歸德國管轄。(2)膠州灣沿岸潮平 100 哩內，劃為中立地區，德國官兵有

<sup>52</sup> 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2冊，頁957。

<sup>53</sup> 梁啟超，《論李鴻章》，頁67。

<sup>54</sup> 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2冊，頁984-87。

<sup>55</sup> 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2冊，頁990-91。

<sup>56</sup> 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2冊，頁990-91。

權自由通行，清政府在該區域內「派駐兵營、籌辦兵法」，須先與德國會商辦理。(3)中國允許德國在山東築鐵路兩條。德國並有權開採鐵路沿線 30 哩內礦產。<sup>57</sup>德國強行「租借」青島成功，西方各帝國主義國家紛紛效法其行徑：英國要求威海衛，俄國索求大連，法國欲租廣州灣，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就在「瓜分狂潮」高漲之際，山東的排外情緒也被激發開來，打著「義和團」旗幟的抗議組織也開始凝聚人心，醞釀另一個更大的風暴。

青島在 1898 年春落入德國手中，山東全省成了德國的勢力範圍。這裡出現了一個疑問，以威廉二世胸懷大志的抱負，德國難道以控制山東為滿足嗎？這個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他覬覦的目光其實是射向黃河中、下游這個更大的區塊。由這裡推斷，德國費盡心機獲得的青島，會輕易地拱手讓人嗎？答案也當然是否定的。以「建立世界的德國」作為職志的威廉二世，肯定不會讓他在東方的勢力輕易消失，於是要全力捍衛在 1900 年竣工的青島總督府，自然是他的遠東艦隊在亞洲的重要職志。

#### 日本覬覦青島與日德在華開戰

立足青島的德國勢力對東亞任何有實權的國家，都是充滿敵意的。對 1895 年以後崛起的東亞「小巨人」——日本而言，青島的德國勢力更是芒刺在背。日本自從 1895 年遭受德國羞辱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後，一直對之耿耿於懷；9 年後，日本認為報復的時機已到。「歐戰」的爆發，為東方這個黷武窮兵的新興軍國主義國家提供了絕佳的出手機會。因此當英國在 1914 年 8 月 3 日對德國宣戰後，東京便迫不及待地在 8 月 15 日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德方必須在一個月內，即 9 月 15 日以前，將膠州灣交給日本。<sup>58</sup>日本當時對德國通牒的理由冠冕堂皇：「德戰艦及各種兵船即退出日

<sup>57</sup> 關於中德〈膠澳租界條約〉的全文內容，可參見〈中德膠澳租界條約〉，資料來源：[http://www.unitedcn.com/05JSZL/07bupingdengtiaoyue/new\\_page\\_5465.htm](http://www.unitedcn.com/05JSZL/07bupingdengtiaoyue/new_page_5465.htm)，或 [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tiaooyue/content.jsp?n\\_id=90](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tiaooyue/content.jsp?n_id=90)。

<sup>58</sup> John E.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p.246.

本中國海面。其不能退者，即卸去軍裝，於九月十五日以前，將膠州租借地，全行交與日本，不得附有條件及索取賠款，以便日後交還中國。」<sup>59</sup>

德國人其實早已洞悉日本人的野心，因為不論是從經濟上或軍事上，青島都佔有重要的地位，於是在日本採取大動作前已先派大將來青島考察，以預作防範。在德方看來，「凡海岸要塞，未有僅受海面砲擊而陷落之戰例。即使海岸防禦之砲台，為攻擊之艦隊所壓倒，然欲為事實上之佔領，亦不能成。蓋艦隊欲進入港灣，尚有無數水雷之衝突。」<sup>60</sup>換言之，日本若來攻打青島，必定海陸兩路進軍。

面對日本充滿挑釁的通牒，德國在青島的五千名官兵上下一心，視死如歸。《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以筆名「僮父」在一篇題為〈大戰爭與中國〉的文章裡，以敬佩的口吻如此道出德國人「共赴國難」的決心：

戰耗傳來，交戰國人民之僑寓東亞，營商業、任教育，及受吾政府之傭雇者，皆棄其職業，託其妻子，聯袂歸國，以效命於疆場，曾無觀望徘徊之意。青島一隅，以五千餘之德人，抗日本全國之海陸軍，眾寡懸殊，應援全絕，而猷效死勿去，寄五千餘通之遺言，以示必死。嗚呼、帳懸佩刀，手書遺囑。吾國古來專閫之將帥，臨危授命，猶為歷史所豔稱。青島五千餘德人，果能視死如歸，同殉祖國，則遺此軍國民之模範，亦足使吾人景仰流連而聞風興起矣。<sup>61</sup>

面對德國守兵頑強的意志，以情報功夫稱著的日本軍方，自然不會掉以輕心。英方原先照會日本，僅希望日本艦隊消滅德國的武裝船隻，以保護遠東自由貿易。<sup>62</sup>但日本政府擴大解釋此照會，以作為侵略中國的藉口，除了拒絕中國限制戰區之建議，另一方面還質問中國外交部，為何對限制戰區之事不先跟日本當局商議。<sup>63</sup>為了安撫列強的疑慮，日本大隈首相向美國聲明

<sup>59</sup> 高勞，〈大戰爭續記〉，《東方雜誌》，11卷3號，頁23。

<sup>60</sup> 高勞，〈戰爭雜話〉，《東方雜誌》，11卷3號，頁8-9。

<sup>61</sup> 僮父，〈大戰爭與中國〉，《東方雜誌》，11卷3號，頁2。

<sup>62</sup>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14年8月。

<sup>63</sup>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14年8月。



對中國領土沒有任何野心；另一方面，則派遣萬名軍隊，出動六十餘艘軍艦，於九月初在山東龍口等處登岸，不僅強佔民房，還驅逐居民掠取物品。<sup>64</sup>

### 日軍攻佔青島(1914)

日本在 8 月 15 日向德國發出「交出膠州灣」的最後通牒，要求在 8 月 23 日正午以前必須獲得德國政府回函。由於沒有獲得德意志帝國對最後通牒的回應，日本於是在 23 日向德國宣戰，開始進行封鎖青島海面的行爲；對日本的動作，奧國於是在 26 日向日本宣戰作為回應。<sup>65</sup>如前所述，日本當局以海陸兩路在 9 月初進軍山東半島。

日軍於 9 月 26 日開始包圍青島，對德軍在華基地展開正式攻擊。《東方雜誌》對這一在中國本土上演的奇特的「歐戰海外版」做了如下的歷史紀錄：

二十八日，(日軍)佔孤山巫山之高地，德兵於海泊左岸一帶，築堡壘、造壕塹，張鐵條網，為防禦線。十月二日晚，德軍夜襲日軍右翼，不克。十日，日海陸軍攻伊爾梯斯山砲台，頗得利。十月初旬，德軍各砲台發砲不絕，每日平均約千五百發。十二日，日德兩軍，由無線電信，於午後一時至三時，中止砲擊，收埋屍骸。日軍奉日皇命，通告德軍，護送在青島之非交戰者及中立國人離去戰地。十三日，兩軍軍使會於東吳家村，協定細目。十五日，美領事及德婦孺若干人，由鐵道至濟南。自是以後，暴風雨屢發，河水氾濫，壕塹滿水，不便行軍。... 十七夜，德之水雷驅逐艦 S 九十號，發射水雷，擊沈日本軍艦高千穗號，死將卒二百八十餘人。<sup>66</sup>

10 月底，日軍開始向德軍的根據地、總督府所在的青島進攻，宣稱在 6 個小時內可以取下有德國守軍五千人的青島。《東方雜誌》以歷史見證人的

<sup>64</sup>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14年8、9月。參見，〈青島-五四運動的導火線〉，「青島之窗」，資料來源：<http://www.qingdaochina.org/cgi-bin/bigate.cgi/b/g/g/http@qingdaochina.org/jdhg/ws/3xZfDe2dFzXhtm>。

<sup>65</sup> 高勞，〈大戰爭續記〉，《東方雜誌》，11卷3號，頁23。

<sup>66</sup> 高勞，〈大戰爭續記三〉，《東方雜誌》，11卷5號，頁14-16。

身份如此報導自 1898 年以來即為德國所佔領的青島的陷落：

十月梢，日軍及英日艦隊，既疊次砲擊小湛山伊爾梯斯山各砲台。十月一日以後，仍繼續攻擊，復向青島市街，為威嚇之射擊，並在浮山所吳家村等地方，開掘攻擊陣地。…五日，日軍用飛機在德軍防禦線上拋擲炸彈。六日，日軍更向前逼進。是夜，日軍第二中央隊，因得掩護擊射之掩護，直向德軍中央堡壘進發。先毀其第一外濠之外岸，及其鐵網，繼復破其第二外濠之鐵網，遂於七日午前一時，實行接近之攻擊。先佔中央堡壘之咽喉，捕虜德兵二百名。時德軍四圍之砲台，知日軍已佔中壘，乃開砲向中央環擊。日兵死傷數十名。日軍旋分兵向各要隘進攻。小湛山北堡壘、台東鎮堡壘，先後陷落，並偕英軍攻佔伊爾梯斯山及俾斯麥克山毛奇山各砲台。德軍海岸砲台暨天文台，於七時半懸掛白旗。十一日，日軍司令官神尾氏與青島總督華爾登會晤，授受青島諸堡壘及其他各物。……十四日，日軍按照與德人所訂開城規約，將人馬物件次第接收。十六日，舉行青島入城式，於是青島完全歸日軍佔領矣。<sup>67</sup>

於是，歐陸霸權德意志帝國在東方的重要據點，便於 1914 年 11 月 7 日，由總督華德克和二千三百人德國俘虜，向日軍司令神尾光臣投降。<sup>68</sup>如此，青島便落入曾「以德為師」的日本手中達 8 年之久。

日本這次透過與英國合作的契機，以優勢軍力擊敗歐洲海陸強權德意志帝國，並快速取下其在華根據地青島，對日本的軍國主義發展起了莫大的鼓勵作用，證明她確實有擊敗中國(1895)、俄國(1905)與德國(1914)等亞洲與歐陸大國的實力，可列世界強國之林而毫無愧色。不過，對中國與亞洲知識份子與百姓而言，日本的壯大則意味著災難的降臨，對戰爭中立國的中國而言尤然。「歐戰」的爆發，中國未蒙其利反而先受其害，日本的山東戰役，使中國的「歐戰」經驗顯然不再是在虛擬(virtual)的「文本」上經歷了第一次世

<sup>67</sup> 高勞，〈大戰爭續記四〉，《東方雜誌》，12卷1號(上海，1915.01.01)，頁15。

<sup>68</sup> 參看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14年11月。

界大戰，也在真實(real)的情境裡體驗到砲火的滋味。

### 三、「歐戰」啟示錄

歐陸自工業革命以來，經濟活動隨著人類宰制自然能力的增強而更趨活躍。市場經濟在日漸完善化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兩大政經體系下，獲得了「正當性」(legitimacy)與活力，並由歐陸伸向世界。帶有掠奪性質的歐陸市場經濟，藉由遠距貿易與複雜的信貸機制，除了為具有冒險精神的少數人創造了難以想像的財富之外，另一方面，也為大歐洲帶來「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轉變——從中古的宗教(精神)主義中解放，而轉入具有「現代性」(modernity)內涵的世俗(物質)主義。歐洲人在「前工業時期」(pre-industrial period)生產不足與物質匱乏的現象，至此明顯改觀。十九世紀中葉，當中國人與英國人因「遠距貿易」(鴉片貿易)發生衝突時，歐洲人已經拜鐵路革命之賜，開始享用平民化的公路運輸。當世界大多數區域的人民還為維持最基本的物質生存而奮鬥，當亞洲的文化古國與大國——中國——遭遇來自體積上與中國不成比例的歐洲國家所帶來的「船堅砲利」威脅、飽受生死存亡的戰慄與折騰時，經歷工業革命與商業革命成效的歐洲，已經開始推銷「享樂主義」的休閒理念了。

到了第一次大戰前夕，歐洲人的物質生活確實經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而發展成某些領域的勞動生產過剩與物質過剩現象，並使這些現象成了「歐戰」爆發的導火線之一。這種細緻的變化，透過《東方雜誌》，轉變了中國知識大眾對歐洲物質文明的意象——遙遠的歐洲與帶有神秘氣息的強權，改以無比親近的姿態，來到中國的面前。作為一份啟迪民智的刊物，《東方雜誌》以「報導」作為基調，它以4年的時間，為中國的知識大眾開啓了一個新穎的「啟蒙」經驗。

### 貼近的西方庶民生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展上，如前面所提過的，中國知識大眾的基本立場是將「歐戰」視為「事不關己」的戰事；儘管山東的砲火事實上與這個戰役脫不了干係。就「歐戰」而言，《東方雜誌》不僅大篇幅地報導軍事戰略與戰爭發展等嚴肅新聞，其記者也以大量的文字介紹了西方生活的種種。由於這些報導是以旁觀者的視野與相對輕鬆的語調來看待西方，如此反更能讓東方的讀者對西方的庶民生活，有一個更真實的認識。例如戰時的德國民間風貌，便以如此貼切的景象出現在中國讀者眼前：

Kurfurstendamm，柏林西城最大之街也，中國使館即購屋於此。平時每日下午，最形繁盛，遊人如雲。開戰數日，尤為擁擠，然均帶有一種莊重之容。搔首弄姿之遊女，意興亦大減平時。吾居 Uhlandstrasse，距離極近，下午五六時，常至此街各宏麗之加非館飲茶閱報，聽奏軍樂。八月初旬，各加非館來人之多，實為吾在德素所未見也。<sup>69</sup>

將喝咖啡、讀報紙這樣的悠閒意象，與飄盪著戰爭氣息的德意志帝國空氣巧妙地連結起來。於是，自在中便有了一份緊張，而緊張中似乎又有了一份愜意。另外，與戰爭息息相關的愛國主義，也以如此曼妙的語調被傳神地表達出來：

德民初極望日本與俄宣戰，以為日本數年前曾與俄有戰事，今必復尋舊仇。智者雖知現已形勢推宜，此為必無之事。然普通心理，則均如此。某日晚約十時，忽謠傳日本已與俄宣戰，德人歡欣無極，街中四處聞日本萬歲之聲。日人大受歡迎，或有抱日人親吻以表其敬愛之意者。中國使館某君，人誤以為日本人，取而高舉空中，期其演說。<sup>70</sup>

由於發生在歐洲的大戰，被當成日人的中國人竟然在歐陸受到洋人的尊敬、擁抱，甚至親吻以表「敬愛其意」，這對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國際形象低落

<sup>69</sup> 夏元璠，〈歐洲戰禍之原因〉（續前號），《東方雜誌》，12卷3號（上海，1915.03.01），頁6。

<sup>70</sup> 夏元璠，〈歐洲戰禍之原因〉（續前號），《東方雜誌》，12卷3號，頁7。

的華人而言，何嘗不是不可思議的事。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歐戰」報導都是感性的，《東方雜誌》也有理性的數據。例如杜亞泉在〈大戰爭與中國〉一文裡，便以數字來說明歐陸的愛國主義現象。他分析道，「歐戰」的主要肇始國之一塞爾維亞，人口只有二百九十萬，兵額有二十三萬，就比例而言，是十三人裡有一人從軍。至於大國如德意志者，18歲至45歲的壯丁有一千二百萬餘人，此次加入戰役的約有三百萬人以上，換句話說，每四名壯丁中有一人從軍。這位《東方雜誌》的主編指出，法國人口比德國少，僅為德意志帝國的十分之六左右，此次加入戰場者約有二百四、五十萬人，參戰比例為三分之一。<sup>71</sup>而「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則是中國的古老傳統，吃兵餉、當兵痞是遭人看不起的。杜亞泉感嘆道：

如此奮勇之國民，直使吾儕聞之，舌橋不得下。吾儕國民，欲於此四郊多壘之秋，爭存立於亞東大地之上，則非激發其真摯之愛國心，忍受劇烈之痛苦，準備重大之犧牲不可。<sup>72</sup>

必須指出的是，愛國主義在歐陸裡已經不再是男性的專利，它也開始變成女性同胞的義務；在戰爭的現實下，婦女問題已逐漸被迫走上歷史的舞台。

戰爭開打後，大部分的壯丁幾乎皆被調到攻擊敵國與防禦母國的疆場前線，於是原先由男性擔任的生計活動，便不得不由婦女接手。至此，傳統上以照顧家庭為天職的婦女，便史無前例地集體走出家庭以服務社會。以民風夙稱保守的德國為例，德皇這句話頗能反映其婦女的社會角色：婦女與軍隊不能同時強大；婦人的天職是在照顧家庭，閒暇時應該彈琴以自娛娛人，禮拜日則當入教堂祈禱，豐富自我的靈性。<sup>73</sup>但由於時空的變化，當國家遭遇空前困難，德國婦女也必須改變舊日「不預聞國事」的性格而投入社會建設；於是，打仗不再是男人分內的事，也成了女人不能置身事外的責任。《東方

<sup>71</sup> 儻父，〈大戰爭與中國〉，《東方雜誌》，11卷3號，頁2。

<sup>72</sup> 儻父，〈大戰爭與中國〉，《東方雜誌》，11卷3號，頁2。

<sup>73</sup> 許家慶，譯自《太陽雜誌》，〈大戰爭與婦人問題之將來〉，《東方雜誌》，13卷2號(上海，1916.02.10)，頁15。

雜誌》在 1915 年春如此報導德國婦女對戰事的關懷：

初六日，德皇在政府官報一訓告人民之文。同日，皇后亦刊一文，告德國各婦女，言能執兵者既已群赴前敵，吾婦女亦當盡力所及，從事各種救助事業，使戰事易於成功。各大報館門前，聚人極多，皆欲探聽新聞者。聞勝報則均色喜。一傳十，十傳百，奔走相告，語聲隆隆如遠雷。遇途人，即告以某處已獲勝仗矣。吾等每日遇此等以新聞見告之人，必數十次。此時報館之勢力極鉅，各種至無根據之謠言，均信為事實。各報館號外傳單，初僱人分送，後因其太緩，則租多數之自動車，飛擲途中，途人爭拾之。吾嘗亦搶得一紙，旁有老婦來手稍緩，傳單為吾所得。予忽忽閱畢，還以贈之老婦，問吾日本將與俄宣戰否？此等問語。吾等已厭聞，初猶立談數語，後止能微笑應之，答不勝答也。甚至小兒亦阻吾於途，問中國將助德否？問君亦將回國當兵否？種種不一。<sup>74</sup>

男丁上前線作戰，婦女遂不得不擔起一家之計的重任。《東方雜誌》記者許家慶在〈大戰爭與婦人問題之將來〉(13卷2號，1916年2月10日)的文章報導說，德國婦女在大戰開始一年半後，不僅能接手家庭生計，還能進一步地將生計活動與與象徵軍事活動意義的軍火工業相結合。例如，在德國的兵站部與槍砲製造廠裡，所使用的女性職員人數，便高達五十萬人以上。這篇文章推論到，保守的德國婦女在面臨國家大難之日，尚能為國家盡義務，其他歐洲國家的婦女便可想而知了。<sup>75</sup>

的確，不僅同盟國的婦女愛國，響應投入社會生產的活動，協約國的婦女也不落人後，積極於所謂的「就職運動」(就業運動)。<sup>76</sup>以英國為例，交通機關如鐵路局之書記，車站內的搬運工作，火車中的查票人員，客車中的清掃事宜，棧房裡的運貨雜役等等，都由女性接手。在威爾斯(Wales)的某個車

<sup>74</sup> 夏元璁，〈歐洲戰禍之原因〉(續前號)，《東方雜誌》，12卷3號，頁7。

<sup>75</sup> 許家慶，譯自《太陽雜誌》，〈大戰爭與婦人問題之將來〉，《東方雜誌》，13卷2號，頁15。

<sup>76</sup> 許家慶，譯自《太陽雜誌》，〈大戰爭與婦人問題之將來〉，《東方雜誌》，13卷2號，頁20。

站，站長也頭一次地由女性擔任。除了鐵路，英國的公路運輸在大戰期間也是處於女權日張的現象。都市裡的重要運輸工作像汽車與電車司機等具有生命安危指標的業務，開始由女性負責掌管。至於像分送牛乳、派送報紙、郵差、電話接線員等等輕便的工作，更是女人的天下。<sup>77</sup>幾個世紀來，男人視自己為社會支柱的神話，隨著女性在職場上的興起，正逐漸解體。這種巨大變化的之所以能夠實現，事實上是由兩隻手所推動的：市場與政府。

在政府方面，隨著戰爭動員所產生勞動力不足的現實，將婦女從無償的家庭奉獻推入有償的社會服務，是一個社會成本不高，而且又受到女性自身歡迎的策略。在「男子力戰於疆場，婦女勤勞於境內」的打動人心的「愛國主義」口號下，<sup>78</sup>國家機器在軍國主義意識型態的驅使下，使用了軟硬兩手策略。一方面，國家機器利用婦女們心性善良的本質，透過她們軟性地「遊說」壯丁們加入戰事，例如，大量散播如下的官方宣傳：「英國的婦女同胞們，趕快盡你們的天職，說服愛你的男子，儘速加入我們有光榮意義的軍隊吧」。<sup>79</sup>「你最愛的男子，已經穿上橘色的軍服嗎？如果還沒，你是否讓他為你穿上軍裝？」「你最愛的男子，今天不對國家與國王盡應盡的義務，日後若完婚，也必定不會對你履行做丈夫的義務。此刻你應三思而行，趕快令你的愛人加入軍隊吧。」<sup>80</sup>另一方面，國家機器則硬性地剝奪那些所謂的「怯懦男子」的工作機會，使他們在沒有就業機會的前提下，被迫選擇軍隊作為職場。例如，海濱公園、劇場、與咖啡館等「怯懦男子」喜愛的業務，悉數規定由女子擔任，將那些避戰的男士在消極的意義上逼入戰場。<sup>81</sup>這種擴充兵源的手段也許不是太正大光明，但作為對抗軍國主義掛帥的德國，卻不失為一個有效的辦法。

在市場這方面，女子除了有心思細密的職場優點外，更重要的是，還願

<sup>77</sup> 許家慶，譯自《太陽雜誌》，〈大戰爭與婦人問題之將來〉，《東方雜誌》，13卷2號，頁20。

<sup>78</sup> 許家慶，譯自《太陽雜誌》，〈大戰爭與婦人問題之將來〉，《東方雜誌》，13卷2號，頁18。

<sup>79</sup> 許家慶，譯自《太陽雜誌》，〈大戰爭與婦人問題之將來〉，《東方雜誌》，13卷2號，頁16-17。

<sup>80</sup> 許家慶，譯自《太陽雜誌》，〈大戰爭與婦人問題之將來〉，《東方雜誌》，13卷2號，頁16-17。

<sup>81</sup> 許家慶，譯自《太陽雜誌》，〈大戰爭與婦人問題之將來〉，《東方雜誌》，13卷2號，頁19。

意接受較低的薪資，這使得資本家樂意接收這個新興的、價廉物美的女性勞動力。《東方雜誌》的報導指出，英國某商號雇用一個男性書記的週薪是二十元，但改用婦女只要七元，幾乎節省三分之二的成本。就銀行而論，一個英國男性書記的年薪約在二千五百元左右，如用婦女只需一千六百元，成本可以節省近三分之一。在官方，英國政府雇用每日工作 12 小時的男性工人，必須支付十六元的週薪，若雇用 20 歲的女子，只須支付五元半。至於 20 歲以下女子的薪資則更為低廉。<sup>82</sup>

雖然「女權主義」的興起後面有市場與政府這兩隻手，而後者的軍國主義角色尤其重要，但「婦女解放運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勃發後，至少就英國而言，已經成了「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的現象了。《東方雜誌》這篇在 1916 年 2 月出版的詳盡介紹歐洲「婦女解放運動」的文章，比胡適在 1921 年 4 月定稿的影響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深遠的那篇〈易卜生主義〉文章，<sup>83</sup>整整早了 5 年，由此愈見《東方雜誌》在中國近代啟蒙運動貢獻上之一斑。

### 軍國主義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

影響二十世紀上半葉政治文化深遠的軍國主義思想，不只在造成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萌芽，還深遠地影響東西方的教育體系，左右了個世代成千上萬的青少年。作為一種服務國家機器的意識型態，軍國主義在外部上講求擴張主義，藉由「物競天擇」的「偽科學」口號，合理化其軍事武力攻擊活動，正當化其侵犯他國行為。在內部意義上，軍國主義以團結社會大眾為口號(通常是透過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或國粹主義的宣傳)，壓制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論點，強調服從、犧牲、忍耐等「美德」，在政治上施行專制主義或準專制主義。

軍國主義思想不只在歐洲發酵，也刺激了被歐陸強權所欺凌過的亞洲區

<sup>82</sup> 許家慶，譯自《太陽雜誌》，〈大戰爭與婦人問題之將來〉，《東方雜誌》，13卷2號，頁21。

<sup>83</sup> 胡適的〈易卜生主義〉，收於《胡適文存》第1集卷4(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74)，頁629-647。



域菁英。受到「富強」理想薰陶的梁啟超(1873-1929)在二十世紀初葉，於30歲前後所寫出的膾炙人口的《新民說》一書裡，便有提倡軍國主義思想的〈論尚武〉專篇。青年梁啟超從「優勝劣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角度，一方面強烈批判使近代中國無法有效回應西方強權挑戰的「文弱傳統」，另一方面則鼓勵尚武精神以矯正中國的「文弱惡習」，呼籲國人效法西方，學習斯巴達的教育精神與德意志帝國的發展經驗，將體育融入幼年的教育體系中，從基礎上徹底建立民族的武勇體魄，以便日後有實力對付外敵。

流亡海外的梁啟超舉當代新興強權德意志帝國為例，為什麼鐵血宰相俾斯麥能為德意志帝國奠下富強的基業？他認為主要原因之一乃在這位不凡政治家具有能勝任繁重工作的體魄：「俾斯麥之體格，重至二百八十餘磅，其筋骸堅固，故能凌風雨，冒寒暑，撻患難勞苦，而貫徹初終。」<sup>84</sup>日耳曼民族注重體能，主因在於德國國家領導人有衛生教育的眼光，例如德皇威廉二世在視察柏林一小學時，便指出體能教育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凡我德國臣民，皆當留意體育。苟體育不講，則男子不能負兵役，女子不能孕產魁梧雄偉之嬰兒。人種不強，國將何賴？」<sup>85</sup>後人習慣將德國獨尊日耳曼民族的種族主義(racism)政策歸咎於第三共和(Third Reich, 1933-1945)的納粹黨人(Nazi)，或指向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這其實疏忽了來自德意志帝國官方意識型態帶有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目的的軍國主義傳統。

對照日耳曼民族的強調體魄而得在近代世界舞台上大放異彩，華夏民族則由於長期不修體能，而種下了近代國運與族運衰弱的禍根。梁啟超憂心地指出近代中國人體質孱弱的原因：

中人不講衛生，婚期太早，以是傳種，種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後，終日伏案，閉置一室，絕無運動，耗目力而昏眊，未黃耆而駘背。且復習為嬌惰，絕無自營自活之風，衣食舉動，一切需人，以文弱為美稱，

<sup>84</sup> 梁啟超，〈論尚武〉，收於《新民說》(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8)，頁117。

<sup>85</sup> 梁啟超，〈論尚武〉，收於《新民說》，頁117。

以羸怯為嬌貴。翩翩年少，弱不禁風，名曰丈夫，弱於少女。弱冠而後，則又纏綿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鬼躁鬼幽，蹉步欹跌，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sup>86</sup>

在這位青年啓蒙思想家看來，近代的中國士人因為普遍不重視勞動價值，而導致集體性的體能耗弱，並進而造成國家民族的存亡危機。他指控道，沒有完備體格的國民，怎麼可能建設出完備的國家？「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sup>87</sup>從梁啓超的角度來看，當代世界是所謂的「武裝和平」世界，和平不是天賜，是靠著武裝的實力才能出現在歷史舞台。在強權環伺、弱肉強食的環境裡，能戰者才有議和的本錢，具國際實力者在世界上才有發言權。和平並不會親近弱者，它是由強者所支配。<sup>88</sup>

〈論尚武〉是近代中國最早介紹與甚至是提倡軍國主義思想的文獻之一，對「五四」時代的領袖們起過深遠的影像。20歲的毛澤東在1914年被他的倫理學老師楊昌濟打一百分的論文〈心之力〉，其「心力」概念便是受梁啓超此文所啓發。對照梁啓超這種對軍國主義思想的硬性「精神喊話」，《東方雜誌》在十餘年後以軟性語調述說軍國主義在歐陸運作的報導，雖然不若梁氏「喊話」那麼激情，但也許更能激起廣大知識大眾的共鳴。

在歐陸各國中，德國是提倡「尚武」教育最力的國家，是執行「舉國皆兵主義」最徹底的地方，為了養成體格強健的學童，學校中特重體育。《東方雜誌》從教育的角度，報導德國軍事教育的特色。「國民達十八歲，悉入兵籍。然上中流之子弟，此時方在學校教育之年齡內，故在學校十分注重體育。至下級之實業者，則此時已出國民學校，故須隸兵籍四年。此四年中當與以軍隊訓練之說，並謂實業學校應更重體育者，至今日以益盛。」<sup>89</sup>可見，德國人並非為教育而教育，而是為國家的需要(嚴格而言，是為國家的軍國主

<sup>86</sup> 梁啓超，〈論尚武〉，收於《新民說》，頁117。

<sup>87</sup> 梁啓超，〈論尚武〉，收於《新民說》，頁117。

<sup>88</sup> 梁啓超，〈論尚武〉，收於《新民說》，頁117。

<sup>89</sup> 章席琛，〈德意志教育之特色〉，《東方雜誌》，12卷6號，頁26-27。

義路線需要)而教育。

《東方雜誌》在介紹歐陸軍國主義教育情形方面，其中最有意思者莫過於有關對兒童「寓教於樂」之戰爭遊戲的報導。德國在柏林(Berlin)市內，常見兒童結隊成群，做行軍遊戲。《東方雜誌》報導說，這些遊戲中的兒童，「隊伍整齊，號令嚴肅。有違犯者，輒受嚴責，受者亦唯唯不敢怨憤。」<sup>90</sup>至於在郊外的兒童，則選擇人煙稀少處模仿部隊紮營，其逼真情況有如作戰。<sup>91</sup>德軍向以服從和武勇聞名於世，《東方雜誌》這種以小品、側寫方式報導德軍強大的秘密，肯定使東方人印象深刻。不僅德國兒童耽溺於「尚武遊戲」，以民風剽悍著稱的俄國和巴爾幹半島中的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也不遑多讓。《東方雜誌》指出，俄國兒童的戰爭遊戲，無處無之，1905年日俄戰爭俄國敗於日本後，俄羅斯境內這種風氣更是昌盛。至於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的兒童戰爭遊戲，則是「常見其兒童肩負洋杖，群行村市間，整然有序。」<sup>92</sup>由此可見，戰爭不單是成人的事業，也是兒童的功課了。<sup>93</sup>

軍國主義的本質，是否只是如梁啟超強調意志面向的所謂「尚武精神」，還是有其他更為複雜的運作機制？《東方雜誌》從經濟的角度，為中國知識

<sup>90</sup> 平佚，〈交戰國兒童之戰爭遊戲〉（〈戰爭雜話〉），《東方雜誌》，11卷5號，頁5。

<sup>91</sup> 平佚，〈交戰國兒童之戰爭遊戲〉（〈戰爭雜話〉），《東方雜誌》，11卷5號，頁5。

<sup>92</sup> 平佚，〈交戰國兒童之戰爭遊戲〉（〈戰爭雜話〉），《東方雜誌》，11卷5號，頁5。

<sup>93</sup> 軍國主義教育不僅激盪於同盟國，也在協約國陣營發出迴響。《婦女雜誌》有關英國「太子從軍」的報導便是一例。出生於1894年6月23日的英國威爾斯親王愛德華(Edward, Prince of Wales, 1894-1972)，13歲時肄業於皇家海軍大學(Royal Academy)。據報導，愛德華親王「能與士卒共甘苦。晨六時半聞號即起，未嘗或遲，渴飲可可，飢餐餅乾，未嘗稍嫌粗惡。」1913年，他以19歲的年紀當上海軍副將的職務。當英國與德奧宣戰時，20歲出頭的愛德華親王，欲率所屬部隊，親赴前線作戰，但以戰術未臻於嫺熟而未能如願以償。愛德華親王並不因此放棄理想，反而更是力求上進，除了「晨夕孜孜，研求戰術」，另一方面則以威爾斯親王名義，募公債以助軍餉。由於愛德華親王受到民眾愛戴，百姓們踴躍輸將，不多久，竟然完成募得鉅款的大工程，與此同時，他的戰術也日臻嫺熟，終於實現了親赴沙場的願望。英國親王從軍的美行，使歐洲人大大地肅然起敬，大大地提振了英國在協約國中的偉大形象。不僅王子如此，公主亦不落人後。愛德華親王的妹妹瑪麗公主，對於戰事的热心與毅力，也有可觀者。自宣戰以後，瑪麗公主也以個人名義募債助餉。此外，她還著手募捐，購辦聖誕禮物送給前線作戰的官兵。為了避開「慷他人之慨」的嫌疑，瑪麗公主常自製玻璃珠頭飾等女紅，義賣籌款，為國效力。詳見，韻唐，〈歐戰軼聞〉，《婦女雜誌》，1卷2號(上海，1915.02.05)，頁10-12。

大眾解開其神秘面紗。德國經濟系統在「歐戰」爆發前，以具有自由主義精神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為主。大戰開啓後，德人覺悟到，個人幸福與國家盛衰休戚與共，個人在經濟上的貧富，與國家在國力上的強弱緊密關連。自由主義經濟也許適合戰前的德國，但在戰爭狀態裡，自由主義經濟不能配合國家發展的需要，也不能驅使勞動者為國家的目的效力，在現實上恐怕就必須做出調整與變化。<sup>94</sup>

對照放任精神的自由主義經濟，德國的軍國主義經濟在精神上屬於計畫經濟的型態。《東方雜誌》注意到，為了讓國家整體資源維持有效的運作，德國的軍國主義經濟至少實踐了下述諸種策略。第一，設置勞動介紹所。戰爭開打後，由於壯丁皆赴沙場，農作物無人收割，勞動介紹所則擔任起介紹因戰爭失業的勞動力，轉到農務工作上。第二，建立借貸金庫與戰時信用銀行。戰爭不利經濟發展，金融業所承受的打擊尤大，為了活絡金融，借貸金庫與戰時信用銀行的設立，則有活水的效果，一方面有助於有資金缺口的工商業與有生計危機的社會大眾，另一方面也有助於保障資金供應來源並從而穩定金融秩序。第三，限制原料品輸出。戰時物資緊張，由國家設立戰事原料品公司，強制收購民間原料如金屬、綿毛、皮革、橡皮等等，或做儲存，或充軍需。第四，食料品之節減與代位。為了對有限的生活資源做最有效的利用，政府執行穀物專賣，介入食品的分配：禁止屠殺牛隻、減釀酒精、令馬鈴薯充當飼料食料等等。德國戰時的所謂「戰爭麵包」，便是將白麵包中和以小麥粉，在黑麵包中和以馬鈴薯粉。第五，限定與國防有關的物價。戰爭開打，食品與軍需用品多半暴漲。為了國防軍事考量，德國政府對馬鈴薯、銅、石油等重要軍需品制訂最高價格。第六，優先撫卹軍人家族。軍人為國出征，其家庭成員若有經濟上的困難，將受到國家的照顧與救助。<sup>95</sup>

德國在歐洲基本上屬於內陸型國家，平和時期其食料與原料品已需仰仗進口(有四分之一的食品仰賴他國)；戰爭開始後，其國境之大部分為敵國所

<sup>94</sup> 小川鄉太郎 著，俞頌華 譯，〈德意志軍國主義之經濟〉，《東方雜誌》，13卷2號，頁29-31。

<sup>95</sup> 小川鄉太郎 著，俞頌華 譯，〈德意志軍國主義之經濟〉，《東方雜誌》，13卷2號，頁26-27。

封鎖，進口供給幾乎斷絕。<sup>96</sup>一向以思慮縝密為外人稱頌的德意志帝國政府，在軍國主義經濟上有這些可貴的巧思與甚具創意的規劃，實在是有其客觀的現實背景。

然而，不論思慮如何縝密，戰爭的本質主要還是破壞不是建設，是消滅對方不是保存敵國。從這個角度來看，現代型態的戰爭打的不是蠻力，而是財力。以德國為例，戰爭造成的舉債現象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德意志帝國在1877年成立不久時，國債僅負七千二百萬馬克。但是到了1914年10月大戰爆發後，由於海陸軍費的增加，國債已到達四十八億二百二十四萬二千馬克以上。國債利息不一，視借貸兩方的條件而定，若平均以三釐半計算，則德意志帝國每年單是國債利息便要負擔一億四千萬馬克以上。這是帝國的部分，各邦的債務還不包括在內(德意志帝國共有三十三邦)，以普魯士一邦為例，便舉債高達一百億馬克，比帝國部分還高，單是利息負擔每年便要五億六千萬馬克。帝國部分與各邦債務，兩者合起來在利息部分，每年便要七億三千萬馬克。這些僅是舊債，德國所募的新債約有二百六十億馬克，還未計算進來。<sup>97</sup>這些數字的真確性也許有待確認，但是以國力之健者如德意志帝國都靠舉債度日，歐陸各交戰國的財政情況也就可見一二。

「舉債度日」是政府的作為，與百姓並沒有直接的干預，但是戰爭帶來的經濟蕭條，則直接威脅了人民的生計問題。德國的對外貿易，原先在歐陸僅居英國之次。1913年時輸出為八十四億馬克(當時一馬克約兌換半個中國銀元)，輸入則為百億馬克。但戰爭爆發後，與交戰國的貿易關係幾乎全部中斷，農工百業，除了軍火業者，多半面臨嚴重衰退，像昔日的貿易大城漢堡，開戰不到一年半則已經是繁華老去的景象。德國截至1916年初，境內泰半還未遭受蹂躪，比起法國、比利時與俄國，算是受創輕微。但是一年八十七

<sup>96</sup> 陳葆，〈歐洲戰時之經濟及財政〉，《東方雜誌》，12卷6號，頁31。小川鄉太郎 著，俞頌華 譯，〈德意志軍國主義之經濟〉，《東方雜誌》，13卷2號，頁28。

<sup>97</sup> 〈戰費〉(摘自《德華日報》)，《東方雜誌》，13卷3號(上海，1916.03.10)，頁7-10。本文附有「大戰第一期十四個月交戰各國之戰債表」。

億六千萬馬克的軍費，實在不是任何政府可以長期承受的。<sup>98</sup>

今日之戰爭，財富之戰爭也。蓋計學大昌，生命亦國家之財產。且今日之財富，國際間又實有共同關係。故烽煙起自一隅，餘波撼及四海，甚至綿互數十年而難收拾，正不必問其為交戰國中立國。凡戰前戰後，戰而或防或攻，不戰而持何等態度，皆與國之財富，息息相通，稍疏忽之，未有不奄奄以死者。<sup>99</sup>

不僅同盟國叫苦，協約國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英國在十九世紀是全歐最富庶強大的國家。但進入二十世紀不久，由於開戰的緣故，戰費消耗了國家三分之二的收入；1916年初，國家的銀行存金竟然不足三百兆美元(按，兆在此為百萬之數，而非現在通行的萬億)。爲了籌措經費，英國政府只好硬著頭皮向與英國打過「獨立戰爭」的美國政府借錢。原先擬募集一千兆美元，後來減至七百五十兆美元，後又減至七百兆美元；經過一再商榷，最後僅募得五百兆美元。<sup>100</sup>爲什麼國家財政如此困難？實在是由於軍費沈重的緣故。英國當時人口四千五百萬，德國人口七千萬。理論上，德國的負擔應該較重，但實際的情形是，英國除了要維持自己的三百萬大軍開銷，還要接濟盟邦的軍隊三百萬。數字顯示，英國人每日戰費爲二千五百萬美元，平均每人每天負擔戰費五角六分。而德國每日戰費二千萬美元，每人每日須負擔戰費二角八分。英國人的負擔是德國人的二倍。無怪乎當時英人有「擔負之重，爲萬國所無」的浩嘆。<sup>101</sup>雖然國家財政如此窘迫，但英國的財政部還呼籲人民要「留其所入之半，以充國用」。<sup>102</sup>輿論對此如此反應道：

多數國民所入，僅敷所出，安有盈餘。且至少有半數之國民，節衣儉食，已至省無可省之地位，何能再加節省，以留其所入之半乎。如謂

<sup>98</sup> 周驚山，譯自日本法學博士田尻稻次郎著，〈時局與美德英法之經濟界〉，《東方雜誌》，13卷3號，頁30-35。

<sup>99</sup> 周驚山，譯自日本法學博士田尻稻次郎著，〈時局與美德英法之經濟界〉，《東方雜誌》，13卷3號，頁30。

<sup>100</sup> 譯自《大陸報》，〈英國戰費擔負之重大〉，《東方雜誌》，13卷1號(上海，1916.01.10)，頁6。

<sup>101</sup> 譯自《大陸報》，〈英國戰費擔負之重大〉，《東方雜誌》，13卷1號，頁7。

<sup>102</sup> 譯自《大陸報》，〈英國戰費擔負之重大〉，《東方雜誌》，13卷1號，頁6-7。

居大廈者當改租小屋，則今日倫敦，已有此種現象。矮房屋之租金，已大漲矣。由是觀之，竟無良策。<sup>103</sup>

這種國家社會窘境，與大不列顛在十九世紀的「日不落國」氣勢，完全走樣。如此看來，軍國主義的發達，並不會因此發達軍國主義經濟，不論是同盟國或協約國。

### 西方物質文明的內容

「歐戰」前的半個多世紀，中國對西方「強兵」的秘密，僅止於少數知識菁英一知半解的理念討論層次，一般大眾並無從認知西方軍事科技的真貌。文本化「歐戰」的「啟蒙」貢獻，在於透過圖文並茂的介紹與說明，讓中國讀者對西方的物質文明——尤其是強大的軍事科技——大開眼界。例如《東方雜誌》12卷1號(1915年1月1日)〈大戰爭中之摩托車〉，便以醒目的多張圖片搭配翻譯文字，說明戰爭中各類機動摩托車(四輪汽車)的軍事作用：德國裝運野戰砲的汽車，比利時的裝甲車，法國的救護車、裝載重砲的汽車、裝載飛機的汽車，英國的運輸車等等。<sup>104</sup>

「歐戰」進行一個月，各交戰國政府在處理軍事資源上莫不各顯神通；戰事才開始，即將境內所有的機動車收歸軍用，以英國一地，短短數週，便收集高達五萬多輛，其政府效率讓人印象深刻；估計交戰各國用於陣地的汽車，應該不下於二十五萬輛。<sup>105</sup>汽車的出現，使傳統的戰爭型態大為改觀，以往由馬匹托運大砲的作戰方式，現在逐漸改為汽車載運；德國的騎兵由於大量使用汽車載運大砲，因而使她的陸軍作戰比他國靈活不少。1914年9月中旬，德國從法國邊境退走，由於大雨泥濘，由馬匹所載運的大砲，悉數棄置於道途間；唯獨由汽車所載運的大砲，則都能安全地運回大本營。汽車的

<sup>103</sup> 譯自《大陸報》，〈英國戰費擔負之重大〉，《東方雜誌》，13卷1號，頁7。

<sup>104</sup> John R. Eustis, 錢智修譯，〈大戰爭中之摩托車〉，《東方雜誌》，12卷1號，頁19-24。

<sup>105</sup> John R. Eustis, 錢智修譯，〈大戰爭中之摩托車〉，《東方雜誌》，12卷1號，頁19。

便利效應，在戰爭的考驗中一覽無遺。<sup>106</sup>

「歐戰」主要以陸戰為主，陸戰的關鍵武器之一是砲彈。《東方雜誌》12卷3號(1915年3月1日)〈新戰術〉一文，以大篇幅相片介紹德國最新的武器機關砲(機關槍)、炸彈砲(迫擊砲)、重量達百噸的攻城砲與攻城砲用的探望燈(探照燈)，以及英軍的三腳麥格沁砲(機關槍的一種)和比利時的防敵用鉤刺鐵絲網等等。<sup>107</sup>在「歐戰」中，一般而言，遠攻時用小口徑的來福槍，攻城砲用開花彈、藥彈、榴霰彈、實子彈，和給機關砲用的大口徑實彈。兵戎相接時，用手擲炸彈(手榴彈)。<sup>108</sup>砲彈如何作用？〈新戰術〉說明道：「藥彈之爆裂也，或以藥性而作，或由衝擊而發。其爆發物中，含有畢克里克酸，『為炭與淡素之化合物』，棉花火藥，及歇馬斯藥粉等。其炸發之力，率甚強大。」<sup>109</sup>為了說明新式彈藥在真實情境中的功效，作者舉「歐戰」前的大型國際戰爭、1905年的「日俄戰爭」為例。旅順治山一役，日俄兩軍相距在三百碼外，俄軍投以榴霰彈，結果日軍二百三十人中，死傷者高達二百十一人，五分之四皆受創於榴霰彈的威力。<sup>110</sup>至於在「歐戰」中，經過改良的大砲，威力倍於以往，不論射程或精確度，都比先前大大提高。《東方雜誌》在1916年報導說，「今日之砲戰，其射程之遠，可於數十里外，轟毀至堅之堡壘。其射線之準，可以一擊之力，殲滅步軍之全隊。碩大無朋之砲彈，撼天動地之炸力，皆開自古未有之新局。」<sup>111</sup>

<sup>106</sup> John R. Eustis, 錢智修譯, 〈大戰爭中之摩托車〉, 《東方雜誌》, 12卷1號, 頁19。

<sup>107</sup> 青霞譯, 美國喬治開南著, 〈新戰術〉(二), 《東方雜誌》, 12卷3號, 頁1-11。

<sup>108</sup> 青霞譯, 美國喬治開南著, 〈新戰術〉(二), 《東方雜誌》, 12卷3號, 頁3-4。另外, 《東方雜誌》, 14卷3號(上海, 1917.03)的〈歐戰中之新兵器〉一文, 則歸納出十一種「歐戰」中常見的新式武器: 一、手榴彈; 二、槍榴彈(改良手榴彈而裝於手槍內發放); 三、投下彈藥(由飛行機投下之彈); 四、迫擊砲; 五、火焰發射機(以石油輕油易於著火之液體, 裝置於唧筒之內, 向敵人注射); 六、毒氣(1915年4月25日在佛蘭特爾附近, 由德軍開始使用毒氣向英法兩軍進攻, 以後東西戰場都使用); 七、毒氣彈; 八、催淚彈; 九、燒夷彈(用砲擊社以燃燒敵地); 十、有潛望鏡照準之小槍; 十一、空雷(與水雷相似, 由飛艇發射)。

<sup>109</sup> 青霞譯, 美國喬治開南著, 〈新戰術〉(二), 《東方雜誌》, 12卷3號, 頁3-4。

<sup>110</sup> 青霞譯, 美國喬治開南著, 〈新戰術〉(二), 《東方雜誌》, 12卷3號, 頁4。

<sup>111</sup> 胡學愚, 譯美國曠觀報陸軍少將法蘭西斯格林演說詞, 〈近世戰術之變遷〉, 《東方雜誌》, 13卷6號(上海, 1916.06.10), 頁7。



良好的彈藥不是來自軍火市場，而是出自優秀的軍火工廠。德國的克魯伯(Krupp)兵工廠，是歐陸最負盛名的軍火工廠，以可靠的品質建立其世界性的聲譽。《東方雜誌》12卷5號〈克虜伯砲廠與攻城砲〉(1915年5月10日)翻譯自 Collier 週刊，介紹了德國埃森市(Essen)的少年鐵匠菲特烈·克魯伯(Frederick Krupp)，如何以其募集的三千美元左右資金，創建近代世界最大的軍火工業之一克魯伯兵工廠。<sup>112</sup>本文對克魯伯兵工廠有如下的評價：

克虜伯廠之工人，咸盡忠職務，謀公司之發達。德國陸軍所以屢奏勝利者，此等工人之力，殆非淺鮮也。試舉其新式攻城砲論之，直可稱歐洲戰爭之魔王。其製作之完美，與力量之偉大，地球上製砲專家，莫不驚怖失色。雖謂作戰之術，因此種攻城砲而革命可也。<sup>113</sup>

《東方雜誌》13卷2號(1916年2月10日)刊出的〈鐵路與戰爭〉，則以號稱「電擊」的德人攻打華沙戰役，說明運輸在現代科技文明中的重要角色。《東方雜誌》報導說：「今日物質文明，行軍用兵之道，迥非百年前可比，而尤以鐵路戰爭為最著。約言其要，厥有三端：一曰軍餉之接濟，二曰軍隊之策應，三曰軍械之運輸。……凡大軍前進，非恃鐵路之脈絡，不能收瞬息千里之效，今人所謂側面運輸之重要者以此。……」<sup>114</sup>

這裡必須指出的是，從現代性的視野回顧「歐戰」以及「旁觀」這場大戰的中國，中國與歐洲的立足點是大大不同的。經歷過從浪漫主義角度批判啟蒙主義、品嚐過文明高峰所產生的頹廢(decadence)現象，歐洲在大戰爆發之際，事實上已經從現代性的「日正當中」(high modern)時刻步入現代性的黃昏期(late modern)。相對於西方的現代性位階，在歷經半個多世紀現代化運動(modernization movement)後的中國，才剛進入新舊交替、與傳統做最後巷戰的「轉型期(1895-1925)」(transitional era)——用現代性的概念來說明，是現代性的黎明期(early modern)。這種時間空間上的位差，表現在物質文明

<sup>112</sup> 錢智修，〈克虜伯砲廠與攻城砲〉，《東方雜誌》，12卷5號(上海，1915.05.10)。

<sup>113</sup> 錢智修，〈克虜伯砲廠與攻城砲〉，《東方雜誌》，12卷5號，頁1。

<sup>114</sup> 宣穎，節譯Helaire Belloc, “The New Warfare and the Railway,” 〈鐵路與戰爭〉，《東方雜誌》，13卷2號，頁43。

上的，便是西方的富強對照東方的貧弱。職是之故，從創新的角度看，這些西方的種種新科技對當時剛剪去辮子、從封建王朝中解放的中國人，多半屬十分新鮮的事物。至於雜誌上刊出的能在天上飛翔的如飛艇與飛機，能潛入水底的如潛水艇，對當時只知道步兵陸戰的大多數中國知識青年而言，更是前所未聞。<sup>115</sup>

潛水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新式軍事武器，在 1913 年間獲得歐陸各主要大國的重視。<sup>116</sup>近代中國最早介紹潛水艇的刊物不是新聞報導性的《東方雜誌》，而是以小說型態出現的、由梁啟超創刊於橫濱的《新小說》(1902-1906)。以「開民智」作為理念的《新小說》，在 1 卷 2 號的小說〈海底旅行〉裡所說的「海底潛行船」，便是日後我們知道的潛水艇。根據這篇由英國蕭魯士原著，南海盧藉東意譯，東越紅溪生潤文的晚清科幻小說，名為「內支士」的海底潛行船不僅在海面上具有飛快的航行速度，<sup>117</sup>還可以快速沈到大海的底部。根據這篇想像的小說，「內支士」內部有豪華餐廳、圖書館、博物館、書房與起居室等等。<sup>118</sup>在船內還可以透過玻璃看見海底的驚奇世界。潛艇內部有各式各樣的航海儀器，像風雨針、經緯儀、海底用的羅盤、測量海水深淺表、測量空氣的壓力表、測量海平線的晝夜鏡等等。<sup>119</sup>晚

<sup>115</sup> 關於飛艇與飛機，見高勞，〈大戰爭續記五〉《東方雜誌》，12卷3號，頁14-22。另外青霞譯美國作者維廉孟格的〈飛行機與戰爭〉，則更進一步地以圖文並列方式說明歐陸主要交戰國的「飛行力」，見《東方雜誌》，12卷5號，頁8-15。至於潛水艇的介紹，見許家慶節譯日本《外交時報》的《歐洲戰亂小史》，《東方雜誌》，12卷2號(上海，1915.02.01)，頁16-25。飛機與潛水艇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當時扮演重要角色的海戰。在海面上航行的軍艦，上方有飛機的空中攻擊，下方有神出鬼沒的潛水艇突擊，使傳統的海上艦隊，受到很大的限制。關於一次大戰中潛艇的價值，可參看謝嬰白翻譯自東京《朝日新聞》，〈戰爭中列國潛航艇之勢力〉，《東方雜誌》，12卷9號(上海，1915.09.10)，頁17-24。

<sup>116</sup> 謝嬰白翻譯自東京《朝日新聞》，〈戰爭中列國潛航艇之勢力〉，《東方雜誌》，12卷9號，頁18。

<sup>117</sup> 「內支士」為鸚鵡螺的名稱，這種動物有種種小室，讓螺可以居於其中。艦長以螺自比，而以艦體比其殼。見《海底旅行》第6回，《新小說》，1卷2號(日本橫濱，1902.11.15)，頁96。

<sup>118</sup> 關於潛水艇的餐房，見《海底旅行》第6回，《新小說》1卷2號，頁96-97。圖書室，見《海底旅行》第7回，《新小說》1卷2號，頁99-101。博物館，見《海底旅行》第7回，《新小說》1卷2號，頁104-105。書房與臥室，見《海底旅行》第7回，《新小說》1卷2號，頁105。

<sup>119</sup> 英國蕭魯士原著，南海魯藉東意譯，東越紅溪生潤文，《海底旅行》第7回，《新小說》1卷2

清科幻小說裡所提到的潛水艇，一般中國讀者可能以「天方夜譚」的心態來對待它，不會認真地當它是一回事。然而不到數年光景，第一次世界大戰出現的潛水艇，已經由想像變成事實，成了令人膽寒的新式武器。

潛水艇在戰略上具有無上的價值。《東方雜誌》指出，以防衛而言，只要在一國的沿岸部署潛艇，則外國戰艦將不能接近，如此，以攻擊作為主要任務的戰艦，其威脅沿岸的威力便可以被大大地消除。就攻擊而言，由於潛艇神出鬼沒，裝備豐富的戰艦以及運送物資的船舶一旦出海，便要面臨受到襲擊的不可知危險。<sup>120</sup>無怪乎當時有軍事家做出如此誇大的比喻：「海上之有潛航艇，恰如陸上之有自動車，以驅逐馬車然，終至於馬車絕跡。今戰艦亦將被葬於海底而無餘隻影。」<sup>121</sup>根據德國的報導，1914年時世界主要國家的潛艇數量是：英國 75 艘，法國 55 艘，俄國 9 艘，德國 33 艘，奧國 6 艘，義大利 20 艘，而在東方的日本，也有 13 艘之多。<sup>122</sup>在數量上，海上強權的英國潛艇的確居各國之上冠。但就性能而言，德國所製造的潛艇則最為優越。其特點在於，它於水中能與在水面上，有同一確實的動作。其次，它能克服險惡天候而充分接近敵艦，給予對方大型戰艦致命一擊。<sup>123</sup>根據 1916 年中的統計，英國船舶被德國潛艇擊沈的數目是，平均每天一又六分之一，損失驚人。<sup>124</sup>另外，報導又說，英國被德國潛艇攻擊而喪失生命的海軍人員，

---

號，頁106。

<sup>120</sup> 謝嬰白翻譯自東京《朝日新聞》，〈戰爭中列國潛航艇之勢力〉，《東方雜誌》，12卷9號，頁22。《東方雜誌》，13卷6號〈潛水艇〉一文指出，潛水艇在戰術上有兩大便利，其一，可以任意浮沈，避敵艦之耳目，而以快砲或魚雷襲擊。其二，沈下水面時，能以鐵甲自衛，而不用擔心砲彈的射擊。見頁1。

<sup>121</sup> 謝嬰白翻譯自東京《朝日新聞》，〈戰爭中列國潛航艇之勢力〉，《東方雜誌》，12卷9號，頁23-24。

<sup>122</sup> 謝嬰白翻譯自東京《朝日新聞》，〈戰爭中列國潛航艇之勢力〉，《東方雜誌》，12卷9號，頁17-24。

<sup>123</sup> 謝嬰白翻譯自東京《朝日新聞》，〈戰爭中列國潛航艇之勢力〉，《東方雜誌》，12卷9號，頁21。

<sup>124</sup> 胡學愚，譯自《美國評論》，〈戰爭中之英國海軍力〉，《東方雜誌》，13卷5號(上海，1916.05.10)，頁21。

截至此時，人數高達二千八百五十四萬人之多。<sup>125</sup>以英國當時人口不過四、五千萬左右，這一數目恐怕有待確認。但這裡不無透露出英國海軍人員受創於德國潛艇的程度。

海上霸主的英國雖然是德國潛艇的主要受害者，但她同樣也是德國潛艇的主要剋星。大戰進行近兩年左右，當時有一種說法是，英國艦隊收捕德國潛艇的數量，已經到達百分之八十四的程度。<sup>126</sup>這一說法雖然為德方所否認，但從相關報導中冤冤相報屢見不鮮的情況，仍然可以窺見英國捕獲德國潛艇的情況，仍時有所聞，而戰俘的命運則每況愈下。

當英艦初次捕獲德潛艇時，於艇中艇員，概不加害。惟以潛艇戰況，非常強暴，故於艇員，不以尋常俘虜待之，而另禁錮一處，以示報施。德潛艇由是憤恨，因而有魯西達尼亞之擊沈。其後有一德潛艇，為英艦所收捕，迫令浮出海面，表示投降。殆潛艇出海後，並不明言願降與否，遽加轟擊，致該艦與潛艇同歸擊沈。自是以後，英艦隊捕獲潛艇艇員，皆處死刑，一無倖免。<sup>127</sup>

與潛水艇同樣被列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新科技的是飛行機。潛水艇或戰於海底，或攻於海上，除了海軍本身之外，一般老百姓鮮能窺見其作戰情形。但飛行機則不一樣，它們經常飛到人口密集的大都會投擲彈藥，造成百姓們生命與財物的重大損失，因此一般人對「空中戰爭」(受賜於「歐戰」的全新概念)的印象，比「海上戰爭」或「水底戰爭」深刻。

「歐戰」之前，飛行機僅為一種新發明，它究竟對人類有什麼功用？在戰事上有什麼價值？世人對其一無所知。「歐戰」期間，飛行機主要包括比較先進的飛機(airplane)與由氣球(balloon)發展而來的飛艇(airship)。對此一新式作戰武器，德國的研究最積極，主張大力發展。法國相對則較為被動，受到德國的猛進態度，才不得不尋求抵制的方法。英國人比法國人更為保守，

<sup>125</sup> 胡學愚，譯自《美國評論》，〈戰爭中之英國海軍力〉，《東方雜誌》，13卷5號，頁29。

<sup>126</sup> 胡學愚，譯自《美國評論》，〈戰爭中之英國海軍力〉，《東方雜誌》，13卷5號，頁25。

<sup>127</sup> 胡學愚，譯自《美國評論》，〈戰爭中之英國海軍力〉，《東方雜誌》，13卷5號，頁25。

對飛機作戰的觀念頗淡，直到德國飛艇盤旋於英倫三島，才猛然驚醒。<sup>128</sup>

由於德國政府的態度，德國的飛行機在歐陸中發展得最好。擁有十二艘飛艇團隊的著名「齊柏林飛行隊」(齊柏林, Zeppelin)，是當時航空界的最大艦隊，實力雄厚，舉世無匹。它所具有的自空中拋擲炸彈的能力，據報導，可以「墟城市，毀砲台，沈鐵甲」，可以消滅一整個聯隊的兵力，威力驚人。<sup>129</sup>當時的觀察家認為，德國有齊柏林飛行隊，猶如英國有海軍艦隊；它遨翔於北海中，偵察敵艦的往來，防守德國沿岸，一如英艦隊之防守英國沿岸般，功不可沒。<sup>130</sup>

在大戰期間，飛機是屬於受到管制的高科技：飛機之圖不容刊佈，飛機廠禁止參觀，私探者有罪，攝影者重罰。<sup>131</sup>《東方雜誌》的情報如是告知讀者神秘的齊柏林飛行隊內部細節：

其製造異常堅固，外以金類板為其護甲，內裝無線電機、機關砲，及照海燈等。機身之長，自四百八十尺以至五百五十尺。有自四百五十至一千零八十匹之馬力。每句鐘速力，自四十以至六十里。航行空中，可自三十五以至四十句鐘之久，且可容大隊士兵，及多數炸彈。<sup>132</sup>

如此詳細的資訊，中國讀者當不會將其與〈海底旅行〉科幻小說相提並論。根據《東方雜誌》所提供的數字，歐洲各交戰國在開戰初期的空中武力是這樣的：飛艇數，德國 600 艘、奧地利 350 艘、法國 1200 艘、俄國 800 艘、美國 500 艘、塞爾維亞 40 艘，比利時 40 艘。在大飛艦方面，德國實力最強，有 35 艘。其他法國 31 艘，英國 15 艘，俄國 16 艘，奧地利 10 艘，比利時 2 艘。<sup>133</sup>因迫於戰需，英德法俄等國的飛行機製造廠都在日夜趕工，故各國空中武力的相關數據，不可能太精確。

<sup>128</sup> 美國維廉孟格著，青霞譯述，〈飛行機與戰爭〉，《東方雜誌》，12卷5號，頁10。

<sup>129</sup> 美國維廉孟格著，青霞譯述，〈飛行機與戰爭〉，《東方雜誌》，12卷5號，頁10。

<sup>130</sup> 胡學愚，譯自《美國評論》，〈戰爭中之英國海軍力〉，《東方雜誌》，13卷5號，頁22。

<sup>131</sup> 美國維廉孟格著，青霞譯述，〈飛行機與戰爭〉，《東方雜誌》，12卷5號，頁9。

<sup>132</sup> 美國維廉孟格著，青霞譯述，〈飛行機與戰爭〉，《東方雜誌》，12卷5號，頁10。

<sup>133</sup> 美國維廉孟格著，青霞譯述，〈飛行機與戰爭〉，《東方雜誌》，12卷5號，頁9。

## 戰爭的真相

這些前所未見的現代軍事科技雖然令人心生敬畏，但它們畢竟都是殺人的工具；愛國主義固然彰顯人性的可貴與可愛，但鼓吹年輕人去戰場當砲灰，絕對是與人道主義的精神相抵觸。《東方雜誌》在 1915 年 7 月如此報導戰爭的慘狀：

數月以來，殺人之凶，兵戎相接，戰雲瀰漫，四海震驚。血肉飛騰，死亡無限，孤寡廢疾，計日而增。獸性軍人，摧毀為能。所向當前，罔知護惜。舉國為墟，古物蕩然。凡此諸情，歷歷在目。孰謂今之戰士，異於昔日蹂躪南歐之匈奴乎。是誠二十世紀之奇辱矣。……德軍之禍比利時也，跡其罪尤，烈於瘟疫；殘暴之焰，舉世為昏；城郭當之而為墟，男女老幼無苟免。……<sup>134</sup>

這裡所說的「獸性軍人，摧毀為能」，是對執行國家命令與捍衛國土之軍人的強烈批判。報導者用如此激烈的字眼，主要是鑑於「歐洲直淪為地獄，歐民悉化為鬼魅，人將相食，有如野蕃」的慘狀。<sup>135</sup>如果這樣的描述略嫌籠統、不夠具體，下面這則報導，也許更能傳神地表達為何軍人需要被如此詛咒：德軍侵略比利時，「勒索鉅款，殺戮婦女；防他生育，斷男兒的左手；防他執軍器，於退兵時，拔盡地方，焚燬村落，叫他不復恢復。」<sup>136</sup>

事實上在戰爭中，軍人只是國家機器中的螺絲，是執行國家政策的工具；該接受譴責的不是軍人，而是軍國主義，是執行軍國主義的國家領導者。軍人在疆場上的命運，「日則赴戰，燃槍擊敵；夜間睡眠，則時時防備敵人之至襲」，<sup>137</sup>其生存處境遠比老百姓們惡劣。《東方雜誌》在 1915 年 6 月如此報導「歐戰」沙場上新式兵器林立的軍事生活：

<sup>134</sup> 張文生，譯自《美國評論》，〈戰後之歐羅巴〉，《東方雜誌》，12卷7號(上海，1915.07.10)，頁32-33。

<sup>135</sup> 張文生，譯自《美國評論》，〈戰後之歐羅巴〉，《東方雜誌》，12卷7號，頁32-33。

<sup>136</sup> 《內外時報》，〈歐戰與哲學〉，《東方雜誌》，16卷1號(上海，1919.01.15)，頁158。

<sup>137</sup> 削峰，〈兵士營中之生活〉，《東方雜誌》，12卷6號，頁12。

近世槍械發明，令人驚訝，槍彈往來，似乎充滿空間，來往速力，撞擊空氣而鳴，其聲不止，似作繼續之呻吟聲，上下左右四旁，莫不皆然。槍聲一鳴，兵士之容頓肅，諧笑談話者即止，遵號令往來，有似大操時。蓋兵士赴戰時，奮勇及鎮靜，可發為至強毅之舉動也。<sup>138</sup>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陸戰特色是壕溝戰，行軍挖掘壕塹是常見的工作，問題是兵士居於壕塹之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長達一週之久。在這樣惡劣的生活中，受傷與犧牲生命是時有所聞的事情。《東方雜誌》對此也有細膩的報導：

兵士中彈受傷，似乎分所應有之事，與常人得小小失意事無異。一軍官面部受彈，去肉一片，模糊狼籍。夷然曰：「敬謝上帝，我之知覺，不至我外象之甚也。」又一愛爾蘭兵受一彈傷，呼曰：「噫！彼畜彈中我矣，必報之。」裝槍待發，又受一彈，呼曰：「又中我矣。倘再如是者……」語未畢，又一彈飛來中之。大呼曰：「此第三矣。彼妖鬼攻我不備耶，狹路相逢，定當教以習稍佳之射擊。」言畢，縱槍亂發，及至創發而暈，彈子之囊已空矣。<sup>139</sup>

這些還不算是最惡劣的情境。以 1915 年 5 月德國攻打法國為例，德軍在攻擊六十號高地時，動用令人聞之喪膽的四十二生巨砲，猛烈攻擊法軍。不僅如此，德軍還動用新發展出來的毒氣砲彈對付法國軍人。德人施用敵氣的方法相當多元，或以汽笛放射，或以砲彈發射，或以瓶裝而投擲至敵方的塹壕，或利用順風而散佈於敵人的戰線。<sup>140</sup>毒氣是一種以綠氣溴氣為主的化學氣體，當人體吸入時，會刺激眼睛與肺臟，使人不能呼吸，並產生暈眩現象，無法執行戰爭行動。<sup>141</sup>在大砲與毒氣的雙重壓迫下，法軍遂不得不自陣地撤退。<sup>142</sup>

<sup>138</sup> 削峰，〈兵士營中之生活〉，《東方雜誌》，12卷6號，頁12。

<sup>139</sup> 削峰，〈兵士營中之生活〉，《東方雜誌》，12卷6號，頁12。

<sup>140</sup> 高勞，〈大戰爭續記七〉，《東方雜誌》，12卷8號(上海，1915.08)，頁11。

<sup>141</sup> 尚一，譯自《歐洲戰爭實記》，〈歐戰中之新兵器〉，《東方雜誌》，14卷3號，頁64。

<sup>142</sup> 高勞，〈大戰爭續記七〉，《東方雜誌》，12卷8號，頁11。

壕溝戰是西方戰場常見到的陸戰型態，它左起北海之濱，右迄阿爾卑斯山，綿綿達三百哩。<sup>143</sup>而毒氣則是將敵人逼出壕溝最簡便的辦法之一。所謂壕溝戰，是雙方深溝高壘，其前又布以銅絲網；要取敵人陣地者，不先以砲火攻其溝壘，則步兵的作用將無法施展。問題是，攻下第一線壕溝後，又有第二線壕溝與第三線壕溝，攻擊之困難，一如第一線壕溝，因此若不是子彈砲火充足而貿然前進，則突然浪費軍人性命而已。<sup>144</sup>張君勱(1887-1968)在1916年春從英國報導壕溝戰之慘烈：「福音堂之役，英人嘗捐三萬人之命，以得一灰燼之村落。英之社會，大咎政府戰略之非。其實此種陣勢，舍捐人命以得尺寸土地外，別無他法。既重人命矣，則惟有坐困而已，此軍事形勢上，英法之不能前進者。」<sup>145</sup>可見，打壕溝戰，是性命消耗戰。

陸戰充滿了危險，海戰也不見得平安。潛艇是新興科技，理論上軍人於此應該享有更多的舒適，但事實上也不盡然。《東方雜誌》報導說，「艇內部狹小，空氣陰寒潮濕，煤氣充鬱，無由宣洩。船員易患頭痛等症。有時為敵所扼，潛浮海底，至四五日而不敢出，煩鬱悶苦，益以恐懼，則船員之不頻於死者僅矣。」<sup>146</sup>這種情況與晚清科幻小說《海底旅行》裡所描述的相對照：潛艇內部有圖書館、起居室、收藏室，在船內還可以透過玻璃欣賞海底的驚奇世界；種種的浪漫情景，頓時化為烏有。

不僅沒有這些浪漫情懷，更惡劣的事實是，有時船員甚至性命難保。英國艦隊原先對捕獲的德國潛艇船員頗為禮遇，後來因為發生潛艇浮出海面後，突襲英艦並因此造成沈沒的災難，英國海軍自是以後，對德國潛艇的被捕人員一概處以死刑。其處死的方法，或用槍斃，或則拘禁於其潛艇內，迫令沈入海底不使浮出，直至氣絕而亡，這種不人道的殺害方式，「其殘酷有

<sup>143</sup> 胡學愚，譯美國曠觀報陸軍少將法蘭西斯格林演說詞，〈近世戰術之變遷〉，《東方雜誌》，13卷6號，頁9。

<sup>144</sup> 君勱，〈歐戰雜記〉，《東方雜誌》，13卷3號，頁3。

<sup>145</sup> 君勱，〈歐戰雜記〉，《東方雜誌》，13卷3號，頁3。

<sup>146</sup> 胡學愚，譯自《美國評論》，〈戰爭中之英國海軍力〉，13卷5號，頁24-25。



甚於飲刃」。<sup>147</sup>

具體的數字也許更能說明戰爭對生命的破壞能力。大戰爆發一年後，依據英國與德國兩方面的計算，其死亡人數在協約國方面：英國十一萬六千人，法國四十萬人，俄國七十三萬三千人，比利時四萬七千人，賽國六萬四千人，日本三百人。在同盟國方面，德國四十八萬二千人，奧國三十四萬一萬人，土耳其四萬五千人。合計一年中，「歐戰」死亡人數總數為二百二十二萬八千三百人。<sup>148</sup>對這樣的慘狀，無怪乎《東方雜誌》在1916年2月要如此報導說：「今日之大戰爭，其武器破壞力之大，損害生命財產之鉅，為亙古所未有，洵可於世界人類慘史上，作一最新紀錄。」<sup>149</sup>

大戰開打才一年，歐洲便已是血流成河的光景，大戰結束，其結果便更可想像。根據《東方雜誌》在1920年的報導，「歐戰」結束後，歐陸實際死亡人數是九百九十九萬八千七百七十一人，重傷六百二十九萬五千五百十四人，被俘虜和行蹤不明者有五百九十八萬三千六百人。<sup>150</sup>這些個統計數字恐怕還算保守。梁啟超在大戰結束之後，親遊歐陸，做實地考察。博學多聞的梁任公在歐陸所獲得的數字——就我們現在對照西方的文獻所知是比較精確的，便比《東方雜誌》的統計高出甚多。根據他的《歐遊心影錄》，歐洲直接與間接死傷於第一次大戰的人口，高達三千六百多萬人。<sup>151</sup>關鍵的不是這個駭人聽聞的數目，而是這些多在壯年的死傷人口。梁啟超從歐陸現場報導說，一旦失去這些重要的生產力，國家的生計發展，便要陷入極大的困難。<sup>152</sup>「……這次戰爭，真算打一場傾家蕩產的大官司。輸家不用說是絞盡脂膏，便贏家也自變成枯蠟。原來，國民生計這樣東西，也和個人生計一樣，若是一家之中生產抵不過所消費，甚或有消費而無生產，不出幾年，這家便要破

<sup>147</sup> 胡學愚，譯自《美國評論》，〈戰爭中之英國海軍力〉，13卷5號，頁25。

<sup>148</sup> 〈歐戰死亡人數之統計〉《東方雜誌》，13卷3號，頁10。

<sup>149</sup> 許家慶，譯自《太陽雜誌》，〈大戰爭與婦人問題之將來〉，《東方雜誌》，13卷2號，頁15。

<sup>150</sup> 詳見波高脫，〈大戰損害之最新統計〉，《東方雜誌》，17卷5號(上海，1920.03.10)，頁41-42。

參見黃金麟，〈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新史學》，第7卷第3期，頁105。

<sup>151</sup>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節錄》(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6)，頁5。

<sup>152</sup>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節錄》，頁5。

產了。一國亦何莫不然。」<sup>153</sup>這場造成無數個家破人亡的超級大戰，在梁啟超看來，已經帶來「西洋文明破產」的夢魘。

#### 四、結語

當「歐戰」爆發後，雖然中國並未派軍直接參戰，但歐洲戰事的發展，在中國新興媒體如報紙與雜誌等連續而大量的報導下，成了這個亞洲新共和國大眾知識生活中的主要議題；歐洲新聞，由以往的配角躍升為新聞版面的主角。拜這場長達四年(1914-1919)之久的「歐戰」大劇之賜，中國知識界透過傳播媒體的力量，對西方文明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親近。「歐戰」對中國至少有四種啓示：第一，近代中國主要是從「文本」的意義上體驗了「歐戰」。從1914年7月28日「歐戰」爆發至1918年11月11日大戰終了整整四個年頭裡，中國經歷了一次獨特但深遠的經驗——在「文本」(text)的意義上，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洗禮。「文本化」的「歐戰」，使中國知識界對「歐戰」的內涵有一個比較超然的理解，對西方文明的內涵(包括正面與負面)有較深刻的認識。第二，日本大隈重信(1838-1922)內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英國聯手發動的山東戰役，使中國的「歐戰」經驗，不僅止於虛擬(virtual)的「文本」上經歷，也在真實(real)的情境裡體驗到砲火的滋味。青島的淪陷與接下來的「二十一條」，使中國與「歐戰」在負面的意義上連接起來，並啓動了影響近代中國深遠的「五四學生運動」。第三，「歐戰」使中國知識界對西方產生一種「啓蒙式」的親近。透過傳播媒體圖文並茂的解說，中國知識界第一次從「啓蒙」的意義上，深刻地見識到西方「富國強兵」的內涵與真相。近代中國的「啓蒙」經驗，由先前的「理論導向」，轉為「傳播導向」。第四，「歐戰」使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文明由敬畏轉為懷疑，由樂觀轉為悲觀。隨著有關戰爭殘暴本質與傷亡人數增加的報導持續地被揭露，西方「文明」與「野蠻」共存的現象，成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困惑。

<sup>153</sup>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節錄》，頁5。

## 參考書目

### 一、主要論文與書籍

1. Hamilton, Paul. "The Rise of Historicism," in his *Historicism*. NY: Routledge, 1996.
2. Lacan, Jacques. "The Subject and the Other: Alienation", and "The Subject and the Other: Aphanisis", in his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Vintage, 1998.
3. Schrecker, John E..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台北：學生書局，1976。
5. 王元化，〈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收於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6. 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研究》，台北：自費出版，1995。
7. 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台北：桂冠，2002。
8. 胡昌智，《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1988。
9. 胡適，〈易卜生主義〉，收於《胡適文存》第1集卷4，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74。
10.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4義和團與八國聯軍》，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
11. 梁啟超，〈論尙武〉，收於《新民說》，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8。
12.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節錄》，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6。
13. 梁啟超，《論李鴻章》，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1。
14. 郭廷以 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15. 郭廷以 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2冊，清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
16.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17. 張玉法 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6輯，台北：聯經，1981。
18. 傅啟學，《中國外交史》，台北：商務，1957。
19. 曾虛白，《中國新聞史》，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66。
20. 黃進興，〈歷史主義〉，收於《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台北：允晨，1992。
21. 黃金麟，〈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新史學》，第7卷第3期(1996)，頁91-131。
22. 劉德美，〈「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張玉法 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6輯，台北：聯經，1981。

## 二、雜誌報紙

1. 《東方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
2. 《婦女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
3. 宣穎，節譯Helaire Belloc, “The New Warfare and the Railway,” 〈鐵路與戰爭〉，《東方雜誌》，13卷2號(上海，1916.02.10)。
4. 韻唐，〈歐戰軼聞〉，《婦女雜誌》，1卷2號(上海，1915.2.5)。
5. 《海底旅行》，《新小說》，1卷2號(日本橫濱，1902.11.15)
6. 高勞，〈歐洲大戰爭開始〉，《東方雜誌》，11卷2號(上海，1914.08.01)。
7. 高勞，〈大戰爭續記〉，《東方雜誌》，11卷3號(上海，1914.09.01)。
8. 高勞，〈戰爭雜話〉，《東方雜誌》，11卷3號(上海，1914.09.01)。
9. 儵父，〈大戰爭與中國〉，《東方雜誌》，11卷3號(上海，1914.09.01)。
10. 平佚，〈交戰國兒童之戰爭遊戲〉，《戰爭雜話》，《東方雜誌》，11卷5號(上海，1914.11.1)。
11. 高勞，〈大戰爭續記三〉，《東方雜誌》，11卷5號(上海，1914.11.1)。
12. 章錫琛，譯日本《中央公論》，〈從文明史國際史上觀察歐洲戰爭〉《東方雜誌》，11卷5號(上海，1914.11.01)。
13. John R. Eustis, 錢智修譯，〈大戰爭中之摩托車〉，《東方雜誌》，12卷1號(上海，1915.01.01)。
14. 高勞，〈大戰爭續記四〉，《東方雜誌》，12卷1號(上海，1915.01.01)。
15. 許家慶節譯日本《外交時報》的《歐洲戰亂小史》，《東方雜誌》，12卷2號(上海，1915.02.01)。
16. 青霞譯，美國喬治開南著，〈新戰術〉(二)，《東方雜誌》，12卷3號(上海，1915.03.01)。
17. 夏元璵，〈歐洲戰禍之原因〉(續前號)，《東方雜誌》，12卷3號(上海，1915.03.01)。
18. 高勞，〈大戰爭續記五〉，《東方雜誌》，12卷3號(上海，1915.03.01)。
19. 美國維廉孟格著，青霞譯述，〈飛行機與戰爭〉，《東方雜誌》，12卷5號(上海，1915.05.10)。
20. 錢智修，〈克虜伯砲廠與攻城砲〉，《東方雜誌》，12卷5號(上海，1915.05.10)。
21. 削峰，〈兵士營中之生活〉，《東方雜誌》，12卷6號(上海，1915.06.01)
22. 陳藻，〈歐洲戰時之經濟及財政〉，《東方雜誌》，12卷6號(上海，1915.06.01)。
23. 章席琛，〈德意志教育之特色〉，《東方雜誌》，12卷6號(上海，1915.06.01)。
24. 張文生，譯自美國評論雜誌，〈戰後之歐羅巴〉，《東方雜誌》，12卷7號(上海，1915.07.10)。
25. 高勞，〈大戰爭續記七〉，《東方雜誌》，12卷8號(上海，1915.08)。
26. 謝嬰白翻譯自東京《朝日新聞》，〈戰爭中列國潛航艇之勢力〉，《東方雜誌》，12卷9號(上海，1915.09.10)。
27. 《大陸報》，〈英國戰費擔負之重大〉，《東方雜誌》，13卷1號(上海，1916.01.10)。
28. 小川鄉太郎著，俞頌華 譯，〈德意志軍國主義之經濟〉，《東方雜誌》，13卷2號(上海，1916年2月10日)。
29. 許家慶，譯自《太陽雜誌》，〈大戰爭與婦人問題之將來〉，《東方雜誌》，13卷2號(上海，1916.02.10)。
30. 君勳，〈歐戰雜記〉，《東方雜誌》，13卷3號(上海，1916.03)。
31. 〈歐戰死亡人數之統計〉，《東方雜誌》，13卷3號(上海，1916.03.10)。

32. 〈戰費〉(摘自《德華日報》)，《東方雜誌》，13卷3號(上海，1916.03.10)。
33. 周驚山，譯自日本法學博士田尻稻次郎著，〈時局與美德英法之經濟界〉，《東方雜誌》，13卷3號(上海，1916.03.10)。
34. 胡學愚，譯自《美國評論》，〈戰爭中之英國海軍力〉，13卷5號(上海，1916.05.10)。
35. 胡學愚，譯美國曠觀報陸軍少將法蘭西斯格林演說詞，〈近世戰術之變遷〉，《東方雜誌》，13卷6號(上海，1916.06.10)。
36. 〈歐戰中之新兵器〉，《東方雜誌》，14卷3號(上海，1917.03)。
37. 尙一，譯自《歐洲戰爭實記》，〈歐戰中之新兵器〉，《東方雜誌》，14卷3號(上海，1917.03)。
38. (內外時報)〈歐戰與哲學〉，《東方雜誌》，16卷1號(上海，1919.01.15)。
39. 波高脫，〈大戰損害之最新統計〉，《東方雜誌》，17卷5號(上海，1920.03.10)

### 三、其他

1. “Beginning in Shantung,” (SVD History in China) [http://www.svdchina.org/eng\\_chinahistory\\_01.htm](http://www.svdchina.org/eng_chinahistory_01.htm)
2. 〈中德膠澳租界條約〉，[http://www.unitedcn.com/05JSZL/07bupingdengtiaoyue/new\\_page\\_5465.htm](http://www.unitedcn.com/05JSZL/07bupingdengtiaoyue/new_page_5465.htm)或〈青島-五四運動的導火線〉，「青島之窗」，<http://www.qingdaochina.org/cgi-bin/bigate.cgi/b/g/http@qingdaochina.org/jdhg/ws/3xZfDe2dFzXhtm>。
3. [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tiaoyue/content.jsp?n\\_id=90](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tiaoyue/content.jsp?n_id=90).
4. 莊樹華，《膠澳專檔》介紹<http://archives.sinica.edu.tw/main/diplomatic09.html>

## War and Enlightenment: Revelation of the World War One to China

Chiu, Eugene W.

Department of History, Tunghai University

Breaking out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the “Great War” of Europe became the First World War; it started from an area military conflict of the Balkan Peninsula to a pan-Europe war. From a sole area military alliance to the world-wide competition of Great Powers, the WWI involved a population of 854,000,000 among the nations participated the war, namely, half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Known as the “Great War” in Europe, this war was called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s the “European War” (Ouzhan 歐戰). Literally, Ouzhan, or the “European War”, meant a war which had nothing to do with China. Indeed, Chinese government did take an armed neutrality policy toward the “Great War” after it broke out for a period of time. Nevertheless, Chinese armed neutrality policy did not prevent her from the attacks of Western guns. After its eruption in Europe, “Great War” showed itself in China proper in a particular way: China’s Qingdao of Shandong province, which was the military headquarter of Imperial Germany in Asia, became an extended battle field of the “Great War” starting from the bombard of English-Japanese alliance against Germany. China was therefore involved into the WWI in a passive, and perhaps innocent, way.

This study has no intention to discuss in a large scale the attitudes of Chinese government toward the “Great War.” Neither, it has any ambition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WWI over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t will, however, examine the Chinese WWI experiences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 First, in what sense did the “Great War” endow its impact on modern China’s “Enlightenment

Movement”? Second, what was the nature of this “Enlightenment impact” out of the WWI? Was it a positive or negative one? Or, was it both? Third, in a more narrow sense, what was the direct impact of the WWI o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trends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Mainly depending on the East Magazine (dongfang zazhi 東方雜誌), one of the everlasting, and most influential as well, non-official magazine in Republican China, this study came to the following major findings: First, in contrast to the previous “elite enlightenment”, a top-down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ypified by the late Q’ing intellectual leader Liang Qichao, the East Magazine through its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reporting of the progress of “Great War” as well the daily life of the West, brought about a so-called “popular enlightenment”, a bottom-up experience. Seco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on the whole experienced the WWI through “text” instead of “bullet”, namely, Chinese came to know the “Great War” through the new media such a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 instead of direct participation of the war. Third, as an agent of “popular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China, the East Magazine reported and commented the developments and its significances of the WWI. More importantly, by introducing the daily practices of Western militarism and the content of Western materialism, the East Magazine with its circulation of 15,000 copies during its high peak, successfully brought the secrets of Western “Wealth and Power” to the fac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maybe populace as well.

**Keywords: Modernity, Enlightenment, Transitional Era of China, Dongfang Zazhi (East Magazine), Du Yaquan, Militarism, Qingdao**